

希腊精神

西方文明的源泉



The Greek Way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黎明，也是人类文明最灿烂的时光。
我们今天的民主、法制、政治公开性这些观念都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
……西方文明中我所热爱的一切，差不多都来自希腊。
理性的开明，落落大方的竞争，坦诚和自信，
对个人人格的尊重和对公益事业的热心，对身体美的热爱，
思辨和求真的爱好，无穷的探索精神，赋予无形以形式的理智努力，
面向更高的生存是希腊的理想。
……用哪个词来描述希腊人？活力，而不是活着。
希腊是一个奇迹。

——陈嘉映

依迪丝·汉密尔顿 / 著 葛海滨 / 译

第六章 柏拉图眼中的雅典人

很久以前——确切的日期已无从查考，但大约是在公元前450年前后——某一个日暮降临的时刻，一支希腊的舰队在爱琴海上的一个岛屿附近抛下了船锚。当时希腊正意欲称霸海上，这支舰队便将在翌日清晨对这个岛屿发起进攻。那天晚上，舰队的总指挥官，传说中说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伯里克利本人，派人去请他的副手来旗舰上啜谈。于是你就会看到他们坐在战舰高高的尾楼上，头上张起一顶华盖来遮挡夜露。侍从中有一个英俊的少年，当他斟酒的时候；伯里克利就因他想起了那些诗人，并引用了他们的一句诗，诗中描写这个小伙子年轻俊美的面庞上闪烁着“紫光”。旁边那位年轻的将军不大同意：他从来都认为那个形容颜色的词选得不合适。他更喜欢另一位诗人把年轻的脸庞形容成玫瑰般的颜色。伯里克利反对他的看法：他说正是同一位诗人在另一个地方也同样把年轻可爱的光彩形容成紫色。谈话就这样进行下去，每个人都援引一句适当的话来应答对方。晚餐桌上的谈话转而成了优雅玄妙的文学评论。可尽管如此，当第二天早晨战斗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些人向这个岛屿展开了攻击，他们不但骁勇善战，而且指挥有方。

我不敢保证这则有有趣的轶事所描述的情况句句属实，但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希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将领们有这样的故事流传下来。从来就没有听见有人说恺撒和忠诚的莱比纳在跨越莱茵河的前一天晚上有过关于色彩形容词的争论，而且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将来任何最富于想像的人也不会编造说格兰特将军和谢尔曼将军在消遣的时候有过这样的谈话。亚里士多德所宣称的那种诗歌的真理高于历史的真理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证实。不管这个小故事是多么的不足为信，它都描绘出了处于鼎盛时期的雅典人生活中的一个真实场景。我们面前出现的是两个有教养的绅士，非常温文尔雅，和诗人广有交游，他们在交战的前夜竟然有雅兴来进行非常深入的文学讨论，但是，尽管如此，任何时代的行动的巨人、战士、水手、将军、政治家在谈论类似的问题的时候都很难比他们谈得更加深入。这样的组合实在鲜见于史册。只有最高度的文明才能让人们在战场上也不失去任何人类价值。

文明是一个被用滥了的词，它代表的是一种高远的东西，远非电灯、电话之类的东西所能包括。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它是对理智的热衷，是对美的喜爱，是荣誉，是温文尔雅，是礼貌周到，是微妙的感情。如果那些我们无法准确衡量其影响的事物变成了头等重要的东西，那便是文明的最高境界，如果人没有因此而变得优柔寡断，人类的生活就达到了一个人们很少能够达到的、更没有人能够超越的高度。很少有人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一个历史时代产生了许多这样的人物，他们能给他们生活的时代烙上自己的印记，这样的时代真的是绝无仅有。

据修昔底德说，伯里克利认为当时的雅典就是这样的一

个时代。他最有名的一句话简短而完美地说明雅典人取得了高度的文明而且在行动上仍然自由果敢。他说雅典人是“热爱美的人，但没有失去质朴的品味，是热爱智慧的人，但没有失去男性的魄力。”

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人没有失去他们男性雄浑的气魄，这一点不需要任何东西来证明。马拉松战役、萨拉米斯战役、温泉关战役，这些永远都是人们在以寡敌众时表现出来的勇气的代名词，而这些勇士的孙辈们在倾听伯里克利上述讲演的时候也正在处在一场严峻残酷的战争之中。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意识到那些无可衡量的事物在希腊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据说，诗人索福克勒斯在其耄耋之年受到他儿子的指控，说他生活已经无法自理。这位年迈的悲剧家唯一的辩护就是向陪审团背诵了他最近写的剧本中的一个段落。陪审团对那些伟大篇章没有充耳不闻。判定一个能写出那样的诗歌的人没有自理的能力？哪个自称是希腊人的人敢做出这样的判决？不：拒绝受理此案；处罚原告；让被告光荣而得意洋洋地回家。

还有另外一则故事，当雅典陷落的时候，斯巴达人要彻底摧毁这座城市，他们要将所有的建筑物夷为平地，雅典卫城连一棵直立的柱子也不留下。就在这一天的前夜，他们召开了盛大的庆功会，负责庆功会中的诗歌朗诵部分的那个人——甚至斯巴达人的宴会上也一定要有诗歌——背诵了欧里庇得斯的一段诗歌，参加宴会的那些人都是在这次战斗中艰苦奋战的粗犷的战士，但在这个伟大的时刻，聆听着那美妙、动人的诗篇，他们忘掉了胜利，忘掉了复仇，他们一致认为

一个能产生这样伟大的诗人的城市绝对不应该遭到毁灭。那无可衡量的事物对希腊人来说是如此重要。诗歌，所有的艺术，都是高度严肃的东西，它成为个人自由和城市存亡之所系，人们显然相信那是完全正当的。

很显然，希腊人的价值观念和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念很不一样。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地、前后一致地、整体地理解希腊人看待生活的态度。按我们的观点来看他们好像有些自相矛盾。人们竟然如此热衷于诗歌，甚至把它当做一种非常重要的实际的东西，我们感觉他们一定缺乏我们所谓的重要的、实际的东西，他们一定是一些耽于梦想的人，对生活中严酷的事实缺乏感触。但事实正好与此相反。希腊人是最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的雕塑雕刻的是他们周围的人物，他们的绘画描绘的也是他们周围的人物，他们的诗歌囿于可能的现实的界限之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头脑冷静的人，所有的这一切皆是他们的心性使然。他们不会受到任何诱惑而脱离实际。我们自己才是多愁善感的人。对我们来说，诗歌，以及所有的艺术，只是生活中的浮泛的点缀，是逃避现实的避难所，因为我们只能通过感情化的东西才能直面严酷的现实世界。希腊人全然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为自己的国家而死是愉快的，这是一个罗马人说的话。希腊人没有说过为任何东西去死是愉快的。事关生死，他们没有谎言。

伯里克利在为那些战死的将上举行的葬礼上发表的伟大演说和其他任何人的纪念演说的风格都迥然不同。他的演讲中没有丝毫激昂的情绪，也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那是一篇思想清晰、言语率直的演讲。他让他的听众祈祷自己永远也

不要像这些亡者一样死于战乱。他没有希望、也没有暗示他面前的那些悲伤的父母们应该因他们的儿子为雅典死去而感到高兴。他知道他们不会感到高兴，他也不会说出任何与事实相左的话。他是这样说的：

你们其中有些人年纪尚轻，还有望再生儿育女，你们的悲伤可能会轻一些。对那些青春已逝的人们，我要说：你们要庆幸你们一生大半的时间在幸福中度过；记住你们的悲伤日子不会太长，要以死去的人们的荣光自慰。

我们会说，这并不让人感到安慰。是的，但是这些人的痛苦是无法安慰的，伯里克利也了解他的听众。他们几乎像他一样总是直面现实。读着这些安静、沉重、实事求是的话，相比之下，我们想起了所有其他那些在埋葬众多无名战士的墓地前的演讲是多么空洞虚浮。

还有一段经常被人引用的话是与这种精神一致的，那就是在温泉关战役中死去的拉喀德蒙人的墓志铭。他们每个人都将战死在那里，这他们事先早就知道。他们在毫无希望获救的情况下直到战死，而他们以此挽救了希腊，但所有那些为他们起草墓志铭的伟大诗人们都觉得最适合他们的话是：

啊，过路人啊，告诉拉喀德蒙人，我们遵照他们的法律，长眠在这里。

我们不服；我们觉得这样的英雄行为应该得到比这更多的颂扬。但希腊人没有这样。事实就是事实，而行动自己会说话。事实不需要任何装点。

我们经常会对一些在我们看来缺乏同情心的词汇产生反

感。俄狄浦斯在他在被放逐之前最后一次出场，当他谈起他的痛苦的时候，他的朋友仅仅是说：

这些事情正如你所说的那样。

而当他说他还不如在幼年的时候就早早死去的时候，他们回答说：

我也宁愿如此。

这样的态度显得有些冷酷，但我们应当时刻牢记希腊人不仅仅能正视现实，他们甚至没有丝毫想逃避现实的想法。当伊芙琴尼亚宣布奥瑞斯忒斯必须去死而皮拉得斯可以获得自由的时候，皮拉得斯拒绝答应这样的条件来换取自己的生命，但他拒绝的方式是希腊式的而不是现代式的。不仅仅是朋友之间的情谊使他不能这样做，而且也因为他害怕别人的议论，他对此非常了然而且毫不讳言：“人们私下里会议论我怎样置朋友的死于不顾。不——我爱你，并且我也怕众人的指责。”这是诚实，可我们已经不能够像这样的诚实了。这使我们感到震撼。雅典人是热爱美的人，他们把诗歌和音乐和艺术作为头等重要的事情——他们学校中的学生们的两门主要课程就是音乐和数学——而同时，他们又是热爱事实的人，丝毫不脱离实际，这两者在雅典人身上的结合使我们感到非常难以理解。品达祈祷道：“愿神保佑我仍热爱美好的事物，为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事物而努力。”而像“我不是那样，但我要努力成为那样，这一点已足以使我感到安慰”这种话从来不会引起希腊人的兴趣。

这些人的价值观念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陌生了，但这些人组成的社会我们多少是可以重新构建的，尽管历史的记载如

通常一样，对我们最想知道的东西几无所言，但我们还是能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有个大致的印象。上述的那些故事告诉我们希腊人是怎样的，但那不是因为像伯里克利或苏格拉底这样那样的一两个人才有这样的看法。一个国家的辉煌业绩，不管多么难以表述，都会在其准则和理想上得到明确的反映。它们准确地昭示了人们的良知，昭示了他们认为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戏剧比他们的历史著作向我们透露了更多关于他们的事情。要想知道维多利亚中期的人，我们不要去读那些历史著作，而应该去读狄更斯，去读 A. 特罗洛普。要了解希腊鼎盛时代的雅典人，我们也不要读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对雅典城的关切比对雅典人的关切更多一些，我们应该去读两个人，他们惟一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非常理解和善于描写他们同时代的人，除了在一点上相同之外，他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截然不同：其中之一就是阿里斯托芬，他取笑希腊人，责备他们，捉弄他们，然而又吸引他们来看他写的每一部戏剧；另一个就是柏拉图，因为他的事业就是对理想的本质进行崇高的思考，他也是研究人、热爱人的人，他的对话中对人物的性格的处理也让我们羡慕不已，这些人物至今仍活在他的书中。

他的对话中的许多人物我们都从别的作家那里读到过。很多当时最有名的人物都出现在他的对话中。那些人是否全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事物，这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们都是不脱离真实生活的人，而且对柏拉图的读者来说，他们也都是完全自然的人，就像任何雅典上流社会的人所习惯的那样。其他的推断都不足为信。假设柏拉图的理想

主义渗透到了他书中的人物身上，让一些对他的学生来说显得不真实，甚至是荒唐的人来阐述他的宗旨的话，那么这简直就是对他们和他本人智力的侮辱。的确，他描绘的不是整个雅典社会的一个横断面，正如特罗洛普描绘的也并不是英国社会的一个横断面。对话中出现了少数几个“社会中不存在”的人物——一个靠背诵荷马的诗篇来谋生的人；一个预言者，对柏拉图来说，这个预言者的社会地位就和牧师在柯弗利爵士^①心目中的社会地位一样——但是柏拉图真正了解的人是雅典的绅士，他了解他们就像特罗洛普了解他那里的牧师和国会议员一样。

他介绍给我们的这个社会具有杰出的文明，人们都乐于运用他们的头脑，他们都热爱美与典雅，就像伯里克利在葬礼上的演说中说的那样，他们对生活中所有的快乐都非常敏感，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永远准备好讨论不管是多么抽象多么深奥的问题：“当我们走进屋子，”——苏格拉底说——“我们发现普罗塔哥拉正在走廊上踱步；他的身后跟着一群听众；他的声音就像俄尔菲的琴声一样吸引着他们跟他走。然后，如荷马所说的那样，‘我睁眼看到’希皮亚斯坐在对面的走廊上，很多人坐在他周围的凳子上面围绕着他。他们向他提出了许多物理和天文方面的问题，他正在解释这些问题。普罗第库斯也在那里，他还没有起床——应该提到，此时天光还甚早，他周围的凳子上坐着不少的年轻人，他低沉优美的声音在屋子里回响。”苏格拉底请普罗塔哥拉跟他们

^① 英国18世纪作家J. Addison和R. Steele主办的《旁观者》杂志所刊文章中的虚构人物，为18世纪理想化乡绅的典型。——译者注

讲讲他的学说，当这个伟人同意的时候，“正如我想像的那样，当着普罗第库斯和希皮亚斯的面，他也会喜欢一些炫耀和赞美，我说：‘我们为什么不把其他的人也叫来听讲呢？’主人卡里亚斯说：‘也许我们能开一个讨论会，你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大家都同意这个建议，每个人都为能听到智者的谈话而感到高兴。”所以他们全都安顿下来，兴高采烈地争论知识和美德到底是什么，美德是否可以习得。

读者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悠闲的社会。苏格拉底对年轻的泰阿泰德谈到“自由人能够支配的闲适。他们能够在安静平和中进行他们的谈话，自由随意地从一个话题转换到另一个话题，他们惟一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真理”。我们几乎不需要亲眼目睹来作为见证：所有那些对话中的背景气氛都是绝对轻松闲适的，人们沉浸在这些谈话中，就像是被带到一个从容、悠闲的世界之中。《理想国》是这样开头的：“昨天我和格劳孔一起去了比雷埃夫斯，我去那里一是向女神们进行祈祷，同时也是为了看看他们是怎样庆祝节日的。完事之后，我们正要回城，玻勒马霍斯和其他几个刚才游行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他问我：‘你们是要回城去吗？可你看见我们有多少人了吗，难道你比这些人还要强壮吗？如果不是的话，你们必须要留下来。’我说：‘可是，没有别的选择了吗？我们不能说服你们让我们回去吗？’‘如果我们要是不想听的话，你能走的了吗？而你应该清楚，我们肯定是要拒绝的。留下来等着看今天晚上的火炬赛马吧。而且还会有一个青年人的聚会，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进行交谈。’”

几乎每一篇对话都是以类似的方式开始的。其中最优雅

清闲的一篇可能是《斐德罗篇》。苏格拉底问斐德罗“你要去什么地方？”，这个年轻人回答说，他要去城外散散步，因为他刚刚和一个修辞学者谈了一个早晨，现在需要休息一下。“如果你能有时间来和我一起走一走，我会对你说说我们都谈了些什么。”苏格拉底说，好吧。他非常想听到谈话的内容，他情愿陪着他一起走到麦加拉，然后再走回来，他不愿意错过这次机会。听苏格拉底这样说，这个年轻人开始怀疑他是否正确地复述，“相信我，苏格拉底，我没有记住他每一句话都是怎么说的，——不，没有。我只记得他大致的意思，可以给你说个大概。”“好的，亲爱的小伙子。”苏格拉底回答说，“可是你首先得给我看看你的外衣里面的那个东西——因为我怀疑那就是真正的谈话记录。虽然我很爱你，可是我不愿意你为了锻炼你自己的记忆力而只让我听你的复述。”斐德罗让步了——，他可以读整个的谈话记录；但是他们坐在哪里呢？啊，就坐在“那棵最高的梧桐树下面，那儿有林阴和清风，还有草地可以随意坐卧。”苏格拉底回答说：“好的，那是个休息的好地方，那儿弥漫着夏天的声音和气息，脚下流淌着清凉的泉水，草地缓缓的小坡好像枕头一样。我正好可以躺下来，你也随意选个能最方便你阅读的姿势，我们开始吧。”他们就这样在梧桐树下度过了几个小时，讨论“灵魂的本质——虽然它真正的形式从来都是一个宽泛的话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人类可以讨论的”；还有“和天体的形态一起闪耀的美”；还有“怀着神圣的畏惧、谦恭地追随着爱人的恋人的心灵”；还有“友情，上天的恩赐”；还有“需要对自然的真理进行深刻思考的各种伟大的艺术”；还有那些人

们，“因为他们认真追求生活，他们应该有一个高贵的名称。我不会称他们为智者，因为这只是属于神的伟大的名称——他们合适的名字是爱智慧的人”。在柏拉图时代的雅典，两位绅士就这样度过一个夏日的上午。

希腊社会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精致、优雅，人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闲适、优雅、讲究。他们最著名的一次晚宴是在高雅的阿伽同家中举行的，这位主人称他从来没有在客人们在座的时候给仆人们下过命令：“我对他们说：你们想像自己就是这儿的主人，我和这些人都是你们的客人；如果你殷勤周到地招待我们，我们就会赞美你。”在这样的轻松随意的气氛里，如果一个熟识的人由于主人的失误而未得到邀请，而他又自己来了，这样的事情若不是因为主人们娴于社交，一定会出现尴尬的局面。而在这里，通过一种优雅的介绍方式他们能让客人立即觉得宾至如归：“啊，欢迎你，阿里斯多德莫，你正好赶上和我们一起喝酒。如果你是有什么事情，先不要说你的事，先来跟我们共饮一杯。我昨天一直在找你，想请你来参加宴会，可怎么也没有找到。”

苏格拉底迟到了。看来他是在来的路上的一个门廊下面陷入了沉思。他进来的时候，“阿伽同要求他坐在自己的身边，‘这样我就能触摸到你，也可以有幸听你说说你在那个门廊下面又有了些什么充满智慧的思想。’苏格拉底一面坐到主人想让他坐的那个位子上，一边说：‘我多么希望可以通过触摸灌输智慧。那样的话我将会非常珍惜坐在你身边的殊荣，因为你可以在我的身体里注入一股明澈奔腾的智慧之流，而我自己的智慧倒实在没有什么’”。一场争论就此开始，阿伽

同让步了：“我辩不过你，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回答说：“不，亲爱的阿伽同，你不如说你辩不过真理，因为苏格拉底是很容易被说服的。”这是完美的社交谈论，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够有这样的言谈举止。这样的言谈举止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培育出来的，但是这些人是在马拉松和萨拉米斯战役中英勇奋战的战士们的重孙辈们。英勇无畏和高度文明的无可衡量的东西是他们生下来就继承了的遗产。

通过那些对话，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的个人形象，他是一个风格独特的哲学家，和任何非希腊的哲学家都迥然不同。大体上来说，其他的哲学家都是一些有点怪异而且沉默寡言的人，至少在我们看起来也是一些索然独处，落落寡和的人物，总是沉浸在深奥的思考之中，有的时候看起来简直不像凡人。康德就是我们心目中最典型的哲学家形象，他两肩微削，心不在焉，终年只是往返于家和学院之间，哥斯堡所有的家庭主妇都按他早晨去上课时路过她们自己家门的时间对表。苏格拉底不是这样的。他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他是一个希腊人。人们对他有太多不同的期待，他也要面对太多不同的局面。我们自己的时代是一个人才专门化的时代，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喜欢安逸的时代。很显然，一个人如果只做一件事情的话，就会做得比较快，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事情要人来做，最合理的方法就是通过各种部署安排他们去做。一双鞋如果由二十个人分工来做，会比二十个人各自去做自己的鞋要快得多，这样就没有人必须得光脚走路了。我们得到的好处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生产的越来越多，而我们付出的代价是限定了每一个独立工作的工人的发展。

在希腊则全然不是这样。相比之下，他们需要的东西要少得多，但每个人都必须要从事许多不同的工作。一个希腊人在他的一生中要扮演许多不同的角色。埃斯库罗斯不仅仅是一个剧作家，他还是一个全能的剧院职员，他不但是演员，还是舞台美术师、化妆师、设计师、技师、出品人。他还是一个曾经参加过战斗的士兵，而且很可能出任过公职，多数的雅典人都是如此。毋庸置疑，如果我们对他的生活了解的更多一点，我们就会发现他肯定还从事过其他的职业。和他齐名的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是一个将军、外交官、神职人员，他同时还是剧院的技术工作人员，最少有一项发明创造。希腊没有与现实生活脱离的艺术阶层、文学阶层、学者阶层。他们的诗歌，他们的雕塑，他们的哲学都是出自于他们的战士、他们的水手、他们的政治家、他们的处理日常事务的人之手。伯里克利说：“总而言之，我觉得雅典可以说是希腊人的学校，每一个雅典人都具备适应许多种不同的工作的能力，而且能够做到多才多艺、优美典雅。”后面的这个词最有希腊色彩。

因此，苏格拉底和我们想像中的任何有学识的人或哲学家完全不一样，首先，他交游甚广，喜欢与人相处甚与任何其他爱好，他这样评说自己：“我是一个热爱知识的人，人就是我的老师。”然而，他更喜欢和有教养的人交往。他喜欢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知道如何把事做好的人。“一个狭隘、狂热、法律观念淡薄——甚至不知道如何像绅士那样穿戴自己的长袍的人”，是他的印象中最为讨厌的人。

他有时候的确给我们介绍了有声有色的同伴。有一次，

他去参加一次隆重的集体葬礼，路上他遇见了一个刚从集市回来的熟人，这个熟人告诉他，委员会正准备为这次葬礼选一个讲演的人，他问苏格拉底：“你觉得如果他们要是选你的话，你能行吗？”苏格拉底回答说：“考虑到我在谈话技巧方面有最令人景仰的女教师做我的老师，如果我说我能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她造就了那么多的能言善辩的人，其中之一就是全希腊最好的讲演者伯里克利。”“我想你说的是阿斯帕霞，”那个人说。“是的，”苏格拉底回答说：“我说的就是她。就在昨天我还听见她为那些死者在起草一份演讲稿。有人告诉她说，雅典人要选择一个人讲演，这跟你说的是一样。她就把她准备的讲演给我讲了一遍，她的演讲中一半是现场发挥，一半是重新组织起来的伯里克利在葬礼上的演讲中的一些段落，但我相信，伯里克利的那篇演讲也是她自己起草的。”这个人问：“你还记得阿斯帕霞说什么吗？”他得到的回答是：“我应该能。因为她告诉了我，而且她都准备要打我了，因为我总是在忘记她告诉我的东西。”然后苏格拉底就把这个演讲从头到尾背了一遍，末了，他告诉这个人，恐怕阿斯帕霞会因为他把她要演讲的内容公开告诉别人而生他的气，他警告这个人说：“你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她，这样我还会把她许多其他的精彩的政治演讲讲给你听。”

在阿伽同家里举行的最著名的晚宴上，聚集了一群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任何其他时代都很难有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这些人里有阿伽同本人，他的一个剧本刚刚获得了头奖，还有那个出色的年轻人阿里斯托芬，他是最杰出的喜剧家，还有亚西比德，在优秀的人中间，他总是最优

秀的——就是这些人和他们的同道们，在苏格拉底进来的时候，他们也把他当做最好的朋友，他们喜爱他、钦佩他，当他是最好的同伴。他们开他的玩笑，拿他取乐，心里却充满了对他的爱慕之情，苏格拉底总是带着理解和一种人情练达的自信，宽厚地接受这些玩笑。“别理他，亲爱的阿伽同，”那个曾在梧桐树下和苏格拉底谈话的年轻人斐德罗说，“他要是找到一个可以谈话的人，特别是一个形容俊美的人，那他就什么也不管不顾了。”

在接下来的谈话里，可以看出来天底下所有年轻人最羡慕的事情，苏格拉底都能做到。亚西比德自己刚来的时候“头上戴着常青藤和紫罗兰编成的花环”，他进门就问：“你们愿意和一个烂醉如泥的人为伴吗？”然后亚西比德力劝苏格拉底喝下整整两品脱的一坛酒，苏格拉底泰然自若地一饮而尽。亚西比德受挫后灰灰地说：“他能饮千杯而不醉。”其实在此之前所有的人都已经同阿里斯托芬说好不能多喝，因为他们前一天已经喝得太多了。“但除了苏格拉底，他可以没完没了地喝下去，也可以不喝，而且他也不管我们喝不喝。”

同样，他也是年轻人心目中最能忍受艰苦环境的典型英雄。有一次亚西比德曾经和他比赛谁更能受苦，事后这位年轻人说：“我有机会看到他超常的忍受疲惫的能力。在给养完全断绝的时候，他坚韧不拔的毅力也是惊人的——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人能和他相比”。那是在冬天，天气酷寒，其他的人都“有丰足的衣物，他们的脚也都用兽皮和羊毛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而苏格拉底“只穿着普通的衣服，光着两只脚，可他走在冰雪上面比别人还要健步如飞”。尽管如此，“如果我

们能够有一次盛宴，他是惟一真正能感到快乐的人”。

叙述者在《会饮篇》的结尾说他们最后全都喝得太多了，他自己酒醉之后一直睡到天亮，醒来之后，他发现除了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阿伽同之外，大家还都沉睡未醒。后二人还在喝酒，而苏格拉底还在和他们谈话。他在说，“真正的悲剧艺术家也会是一个喜剧艺术家。其他两人都不得不表示同意，因为他们早已醺醺然，没能跟得上讨论。阿里斯托芬首先睡着了，然后阿伽同也支持不住了。苏格拉底把两人安顿好，然后悄然离开了。他在吕克昂洗了一个澡，然后像平常一样度过了这一天”。

他也能让上学的孩子感到轻松愉快：“他的朋友美涅克塞努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然后吕雪斯也坐了过来。我问他们，‘你们两个谁大？’他回答说这是他们两人一直在争论的问题。‘谁更好看一些？’这两个小伙子笑了起来。‘我不会问你们谁更富有，’我说，‘因为你们两个人是朋友，是不是？’‘当然是，’他们回答道。‘朋友之间的东西都是共有的。’我说，‘因此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不可能比另一个富有。’‘是的，没错儿，’他们都同意。”

谈过友谊的问题之后，他们的老师过来催他们回家，因为这时天色已晚。“然而，我在分别的时候跟他们说了几句话：‘啊，美涅克塞努，吕雪斯，我这里有个笑话：你们两个小孩子和我，一个想和你们一样小的老孩子，认为我们大家是朋友，可是我们还根本不知道朋友到底是什么！’”

这样的—个结论，或者毋宁说这样的缺乏—个结论，正好可以看出在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教师中，惟苏格拉底所独有

的态度。他不会替前来找他的人思考，不管他们问的问题是
大是小。在《克拉底鲁篇》中，有一个年轻人和他的朋友来
找他问一个语言的问题，还有名称是怎样形成的。他们得到
的回答仅仅是：“如果我以前不是那么穷困，那么我就可以交
足五十德拉克马的学费，去听伟大的普罗底卡关于语法和语
言的完整课程——这是他的原话——那我现在立刻就能回答
你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我只听过一德拉克马的课程，所
以我不知道这些问题的正确结论。可我仍旧愿意帮助你们研
究这些问题。”然而，这个研究的结果是这样的：“这可能是
真的，克拉底鲁，但也很可能不是真的；所以我希望你们不
要轻易地相信这些东西。认真地思考，因为你们还年轻，正
处在学习的阶段。你们找到真理之后，来告诉我。”那个年
轻人——他一定非常年轻——这样回答道：“我会照你的话去
做，苏格拉底。”

佯装不知、不下结论是他最显著的特点。他在让同时代
的人明白希腊也存在着这种黑暗的罪愆，他也一直带领他的
时代走向伟大的思想，走向对自己最高使命的理解，他这样
做的时候，从不咄咄逼人，他总是持谨慎怀疑的态度。他好
像在说：“我知道那可能是全然错误的。”他只是建议——后
面总是有一个问号。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发展到巅峰时，最洞
明世事的人所持的态度。

我们一定要举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古怪的否定态
度下面其实蕴藏的非常严肃的东西。这个例子选自苏格拉底
和斐德罗在一次夏日闲步中的谈话——“通往雅典的路难道
不是为了闲谈才修建的么？”那个年轻人问，波瑞阿斯带走俄

瑞提亚的那个地方是否就在附近：“那条小溪清澈见底，令人感到非常喜欢。我能想像少女们一定喜欢在那里嬉戏。告诉我，苏格拉底，你相信这个故事吗？”苏格拉底回答说：“智者对此都很怀疑，如果我也同样怀疑这种说法，那也并不奇怪。我可能有一个理智的解释，那就是，俄瑞提亚在嬉戏的时候，一阵来自北面的狂风把她吹过了山崖，因此人们就说她被风神波瑞阿斯抢走了。我现在承认这种寓言式的解释非常好，可是生编故事的那个人却不值得羡慕：他绞尽脑汁，穿凿附会；然后他还必须重新解释半人半马的怪兽、狮头羊身的喷火怪物、蛇发女妖和长翅膀的飞马，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思议的、诡异的怪物。而如果他愿意遵从自然的可能性，就会节省很多时间。我现在没有闲暇去问这样的问题；我能告诉你为什么吗？首先我必须了解我自己，正如德尔菲的墙上刻着的那句话；当我对自己还很无知的时候，对我不感兴趣的东西表现出好奇实在是很荒唐。所以我对所有这类事情都不予理睬。我想要了解我自己：我是一个比毒蛇泰弗还要诡计多端、还要受狂热的激情所驱使的魔鬼呢，还是个秉承了自然所赋予了谦恭、神圣的命运的简单温和的动物？”

大多数现代人都习惯并且热衷于权威的和武断的话语，对这些人来说，一个像苏格拉底这样毫不教条的教师会让他们感到震惊，甚至会感到无法接受。但是，在雅典，起码在柏拉图时代的雅典，一个人如果要是想掌握一些真理，那他自己就必须是一个研究者，这样的想法是吸引人的，而绝不会是令人反感的。我们完全可以承认柏拉图在这些方面对希腊的方式有一定的了解。苏格拉底嗣后的许多年里，他一直

在世界上第一所学院里教育雅典人，而我们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任何东西说明他的教学方法不受人欢迎。如果柏拉图的对话录在某些结论之外还能导出任何其他结论，那就是雅典人不希望有任何人来替他们自己思考。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尽管苏格拉底远非凡俗，他还是充分说明了那个时代的一些普遍情况。那是一个文明的时代，那个时代中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那些曾被人触及的、尝试过的、或是处理过的东西、那个时代的伟人们都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诚意求知、求真，那个时代的人们敢作敢为、能忍受艰苦，并且能够作出像他们的时代之前的若干年里出现的那种英雄业绩。理智和精神的平衡是希腊艺术最显著的特点。理智和精妙的品位，以及无尽的生命力是这个民族最显著的标志——这就是柏拉图眼中的希腊。

第八章 希罗多德

第一位旅行家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处的时代，正值希腊为争取自由同波斯进行战争的时代，在这场战争中，希腊战胜了强大的波斯。他们赢得了这场战争，因为他们是作为自由人来捍卫他们的自由，而他们的敌人则是一个暴君和他的奴隶组成的军队；希罗多德亲眼目睹了这场战争。希腊人的口号是：自由。战争的胜负将决定希腊是独立，还是沦为奴隶；这场战争的结局使希腊永远不会成为奴隶。

我们现代的读者看完这句充满自豪的话，肯定会提出一个他们觉得疑惑的问题。这些希腊自由人所拥有的奴隶又怎么解释？战胜波斯之后，这些奴隶并没有获得自由。那些马拉松和萨拉米斯战役中的胜利者都拥有奴隶，在他们的心中，自由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能体现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和古代人是多么不同。对古代世界来说，解放奴隶可能是最无用的废话。奴隶从来就有。在任何社会中，人们的生活都要靠他们来维持；他们是一种最基本的需要，完全不经字面意义上的思考就被人们接受下来了；从来没有人对他们多加注意。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希腊人的生活也建立在奴隶的基础之上，但是除了偶尔在一些地方提到某个个别的奴隶，直到伯里克利的时代，在希腊文学中

都没有出现有关奴隶的记载。在《奥德赛》中提到的那个老保姆，或是那个善良的猪倌，他们的境况被作为最普通的自然现实接受下来了。从荷马到埃斯库罗斯都是如此。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克吕泰涅斯特拉对沦为她的奴隶的特洛伊公主卡珊德拉说：

一个人如果被这种命运逼迫，
那么落在一个继承祖业的主人手里，
是一件值得感谢的事。有些人一本突然收万利，
可是他们对奴隶在各方面都很残忍，而且很严厉

.....

你已经从我这里知道了我们怎样待奴隶。^①

从远古开始，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对待奴隶的态度都是如此。任何一个梦想家，无论他多么大胆、多么浪漫，也很难会想像出没有奴隶的生活。最崇高的思想家、理想主义者和道德伦理家从来也没有觉得奴隶制是罪恶的。在《旧约》中，奴隶制未经任何论证就被接受下来了，这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史料中也是一样。甚至连以色列的预言家对此也没有一句微辞，在这一点上，哪怕圣保罗也不例外。所以，真正令人惊异的事情不是希腊人在好几百年的时间里都认为奴隶制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他们最终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疑问。

这个荣誉应该属于欧里庇得斯，他是第一个对奴隶制提出责难的人。他说：

① 译文引自《阿伽让农》，罗念生译。

那罪恶的东西，本质上就是罪恶的，
强迫一个人屈服于
任何人都不应屈服的东西。

他在很多问题上都走在时代的前面，在这个问题上更是如此。甚至一代人之后的柏拉图，也没有能跟上他的脚步。柏拉图从来没有任何反对奴隶制的言论；晚年的时候，他甚至提倡奴隶制。尽管如此，有迹象表明他曾经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他说：“奴隶是令人尴尬的财产。”他的思想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奴隶制已经让他产生了很不安的感觉，而且在他的理想国中，没有采取奴隶制。

除了柏拉图这种温和、间接的异议，以及欧里庇得斯的公开指责，我们不知道对奴隶制的反对为什么、又是怎样广为接受的，到了柏拉图的下一代，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对奴隶制的反对公开化了。亚里士多德本人虽然有着超人的思想，但他也只是从一般常识和社会便利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奴隶制对当前的社会延续是必要的，他也不想要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他把奴隶定义为“一部会呼吸的机器，一件会活动的财产”。这其中没有明确的反对，也没有暗含的不同意见，但这种对事实冷峻、清晰的描写常会开阔人们的眼界，使人们感到巨大的震撼，从而使他们产生反抗情绪。反对奴隶制的人不断增加。“有的人”，亚里士多德写道——这其中并不包括他自己——“认为人拥有奴隶是违背自然法则的，因为一个奴隶和一个自由人的区别完全是因袭的，并非自然使然，所以奴隶制的基础完全依赖于暴力，因此完全是非正义的”。

这是希腊人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达到的思想高度，而不到一百年前，为了取消奴隶制度，美国人还不得不进行一场激烈的内战。这里提出的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不是希罗多德为什么没有觉得为自由而战斗的战士们本身却是奴隶是件奇怪的事情，而是为什么在所有古代史和大部分现代史的历史进程中，只有在希腊才出现了许多既有真知灼见，又英勇果敢的伟人，能够看透掩盖着传统奴隶制社会的面纱，并揭露出它的本质。亚里士多德嗣后的几年内，斯多葛学派的人就开始谴责奴隶制，认为这是人与人之间最无可容忍的关系。

有人把聪敏出众的年轻人泰阿泰德介绍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对他说，他敢肯定他一定思考了许多问题。这个年轻人回答说，啊，不——不是这样的，但至少他对很多问题都感到困惑。“啊，那就能说明你是一个爱智慧的人，”苏格拉底说，“因为智慧源自困惑。”

几乎从来没有人像希罗多德那样有那么多的困惑。他总是写这些话：“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告诉我”；“在那片土地上有无数令人困惑的事情”；“那些都是令人困惑的事情”；“这件令人困惑的事值得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他那个时代——希腊最伟大的时代的真正的时代之子。他在世的时候，他的同胞们正运用他们从击败波斯人的战争中获得的自由来思考各种问题。他们不再需要把他们的主要精力花在战争上。虽然有些地方间或还有一些争战，但都是些零星的战火。从整体上来说，希腊是和平、繁荣的；希腊人有时间坐在家中来探索宇宙间的神秘、来与苏格拉底进行争论，或到国外旅行，去探索这个世界。无论怎样，他们都积极地找些事来做。

在那个时代，闲暇就意味着积极地参加各种活动。没有人再需要别的东西。充沛的精力、昂扬的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的标志。

希罗多德生在哈利卡那苏斯，但他在精神上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雅典人，他的身上体现了时代的活力。他四处旅行，凡是当时人们所能到达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迹。我们今天实在难以想像出当时的旅行条件需要人们有多么坚强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我们可以从圣保罗前往罗马传教的旅程的前半部分，了解到在希罗多德死后四百年，海路旅行仍旧要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而色诺芬描写的步行或骑马穿越亚细亚无尽的、毁于战火的残迹前往巴比伦的旅程，则给我们描绘出陆路旅行又要经历怎样的艰苦跋涉。一个人对知识要有如饥似渴般的追求，还要有探险家的激情，才能像希罗多德那样的去旅行；也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快乐。他是世上第一个旅行者，而世上也再难找出第二个像他那样快乐的旅行者。如果他能看到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东西，那么所有的不便、困难和危险对他来说都微不足道了。他似乎从来都没有注意到困难和危险。他也从来不记述这些困难和危险。他的书中充满了使人感到快乐的奇妙的事物——这个伟大的世界上无处不在的奇妙的事物。啊，这个世界怎么会充满这么多美好的东西！

很难说清他到底走过多少地方。他对他听到的东西也像他亲眼看到的東西那样都赋予极大热情，他又是如此客观，无论他在描述什么，他都如此沉浸于他所描绘的事物之中，通常会置自己于事外。我们可以肯定他的足迹东到波斯，西至意大利。他曾到达黑海的岸边，也曾到达了阿拉伯。在埃

及他沿着尼罗河一直走到了阿斯旺。他很可能到过昔兰尼；从他的游记中看起来他描写的像是自己亲眼所见。他写的关于西西里和利比亚的作品虽然不太像是自己亲眼目睹的事情，但他确实非常可能到过这两个国家。实际上，他几乎走遍了当时人们已经了解的世界的尽头，他收集到的资料甚至还超过了这个范围。他对印度就颇有了解。例如，那里的有些树上长着许多毛状物，无论从色泽还是手感上来说都比羊毛要好得多。印度人用它们来制作精美的衣物。他对东方的了解止于印度。他听有人说更远处有一片无尽的大沙漠，但也仅此而已。谈到西方的时候他写道：

我不能说得非常肯定。我们用的锡是从某些岛屿运来的，但我对这些岛屿一无所知，虽然我四处打听，但没有碰到任何人说在欧洲的西边看见大海。事实是没有任何人发现欧洲是否被海水包围着。

有人说，海水绕着圆形的大地流动，但是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对此我只能付之一笑。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希腊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曾经说过大海像河一样围绕着大地流动的人有荷马，这位可敬的，甚至是神圣的权威人物，还有赫西奥德，仅次于荷马的伟大人物，希罗多德没有怕对他们失敬而不安，他对他们同样付之一笑。他曾经发表的一份直率的声明最可以说明他的性格，在这份声明中，他指出德尔菲的女祭司在处理纠纷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地收取贿赂，宣布偏袒一方的神谕。这是对希腊最高神职人员的攻击——就像我们今天指责教皇受贿一样。希罗多德对德尔菲的神谕非常尊敬，但对他来说，既然他曾

经做过调查并且他相信情况属实，那就没有任何理由能阻止他进行指责，也绝对没有任何理由能让他放弃调查。当权威和事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不管这个权威在传统上多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希腊人都会选择事实。他们没有任何要保护“先世古训”的想法。希腊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股新的力量，那就是个人倾向和成见必须要服从于真理的观念。

希腊人总是热心于考察、求证、批驳，希罗多德便是他们最杰出的代表。他有一种强烈的发现的欲望。他给自己定下的任务不啻是要去发现这个世上的一切。人们总是称他为“历史之父”，但他也称得上是地理学之父、考古学之父、人类学之父、社会学之父，或是其他任何和人类本身和他们的生存环境有关的科学之父。他的毫无偏见已臻极致。希腊人轻视外国人——他们称外国人为“野蛮人”，但希罗多德从来不这样。希腊和波斯争战的时候，他坚定地站在希腊这一边，但他也钦佩波斯人，也赞美他们。他认为波斯人都很勇敢、侠义、诚实。他在腓尼基和埃及的见闻对他来说都是很值得赞叹的，即使在野蛮的赛西亚和利比亚他也能找到值得赞美的东西。他到国外去不是为了发现希腊的优越之处。偶尔低人一等的感觉让他感到很高兴。他曾戏引居鲁士描写希腊集市的一段话，说那是：“人们用誓言互相欺骗的地方。”

希罗多德这样写道：“人们如果有机会选择他们自己最好的生活方式，他们会选择自己的方式。”有一次，大流士问几个希腊人，什么会使他们生食他们父母的尸体，他们都心怀恐惧地说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做出这样残酷的事情，然后大流士就叫人带进来几个印度人——生食父母的尸体正是他们

那里的习俗，然后大流士问他们怎样才能劝服他们把死去的亲人用火焚化而不是把他们吃掉，那几个印度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厌恶的表情，请求大流士再也不要说出这样令人恶心的话来。希罗多德得出结论说：“正像品达所说的那样，习俗高于一切。”这个故事说明了他对别人生活方式的宽容态度，不管这种生活方式有多么古怪。他是一个罕见的人，他热爱人类。他喜欢人，所有的人，他从不把他们理想化。普鲁塔克甚至指责他虽然善良和公正，但这种善良和公正实际上却是有害的，因为英雄在他的笔下并不总显得那么英雄。他确实生活在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而他却从来没有真正地相信英雄。但是他温和的怀疑精神在两方面都起作用。他从不裁判，也从不谴责。人类的弱点和愚昧只会引起他的怜悯。诚然，他书中的立下丰功伟绩的英雄并不尽善尽美，但是他笔下的恶棍也从来不全都怙恶不悛。他用同样的冷静的、平等的目光看待他们。

他对人世间任何地方的任何事物都有浓厚的兴趣。他告诉我们伊利里亚的相貌平庸的姑娘们怎样赢得丈夫，居住在湖边的人们怎样防止他们的孩子失足落水，埃及的蚊帐是什么样子的，波斯国王旅行的时候只喝开水，阿杜尔玛奇达伊人驱除跳蚤的方法，阿拉伯人怎样理发，多瑙河岛上的居民闻到某种味道就会醉倒，赛西亚人怎样给他们的母马挤奶，在利比亚，情人越多的女人越光荣，巴比伦城的街道是怎样分布的，埃及的医生各有擅长的专科，等等，等等。这种零零碎碎的见闻和他的主题往往毫无关系，却不断在他笔下涌现出来；但他对这些于主题无关的东西是如此兴味盎然，因

此读者也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对我们说，难道那不是太离奇了吗？那不是太有趣了吗？那不是太合情合理了吗？于是我们就跟随着他，感到吃惊，感到愉悦，感到契合。当然这只是说他具有一个作家所必需具备的素质——他从来不令人感到枯燥乏味；而不枯燥乏味对一本导游书籍来说就是非常成功的了。他的著作让人读起来觉得生动有趣，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那完美独特、轻松自然的写作风格。他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没有丝毫的个人意识；他永远是那么简朴、那么直率、那么明晰，永远那么简单明了。他的同乡哈利卡那苏斯的狄奥尼索斯说，他是第一个让人认识到散文和诗同样可贵的希腊作家。

人们常常指责他过于轻信，甚至到了愚蠢的地步。人们说他像一个孩子那样幼稚单纯，相信人们告诉他的任何事情，包括很多非常荒诞不经的东西。这种指责毫无根据。事实恰恰相反：他是一个生性怀疑的人；一个天生喜欢考证的人。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历史这个词，是他首先使用的，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原意就是考察。他的著作是这样开始的：“这是哈利卡那苏斯的希罗多德所作的考察记录。”在这些记录中，他对每一件他听到的事都作了详细的考察。当一件事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记述，而两种记述都同样可信的时候，他就把这两种记述都写下来，留给读者自己去做判断。这时候他总是说：“我不能确定事情到底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他在他很有名的一段文章中说：“对我自己来说，我的责任就是把我所听到的事情记录下来，但这不等于说我相信所有的这些事，这对我这整整一部《历史》都是适用的。”

甚至通过这寥寥的几段引语就可以看出他的性格，他作为一个记录者的责任感，以及他在斟酌证据时候的小心谨慎。但是，在那个时代，人们还不了解的东西太多，而真正了解的东西则太少，可信与不可信之间尚无明确的界限。如果我们仅仅把事情是否真的可能发生作为依据，来推断希罗多德接受一件事情而否定另一件事情的原因，往往会一无所得。他坚定地认为鸽子不会说话，虽然多铎纳的圣女告诉他鸽子会说话，他仍坚信自己的观点，但他却毫不怀疑母马会生兔子。埃及的僧侣说，长生鸟会把它们父母的死尸包裹在没药里，然后从阿拉伯运到太阳城的太阳神庙埋葬起来，无论他们怎么说，希罗多德都坚信这断然不可能。可是另一方面他又相信在利比亚确实存在着一种眼睛长在胸前的无头动物，埃及的猫有爱往火里跳的古怪习性。他有一个标准来确定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不会发生，但他的标准和我们现在的标准非常不一样，我们对他的那些标准已经无从了解。他在他走过的任何地方都看到了许多奇异的事物，这就使他相信在他还没有到过的地方一定还有更加奇异的事物。

但是，对于他了解的事情，他知道他能够准确地判断哪些事情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他这样写道：

在巴比伦最高的那座塔的最高处有一间小室，室中有一张很大的卧榻，有人说，神的真身就睡在那上面。祭司就是这么告诉我的，但是我并不相信。

我并不能确定地说那个人是如何逃跑的，因为我听到的解释让我感到疑惑。他们说跳入海里，一口气游了八十斯塔地，没有浮出水面来换气。依我看来，他是

坐船逃跑的。

但是他对别人的意见总是抱着温和的宽容态度，从不武断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当他谈到薛西斯的舰队在暴风雨中倾覆的时候，他写道：

暴风一共持续了三天。最后，玛哥斯僧行了牺牲之礼，对大风念了镇风的咒语，又向帖提司和涅列伊戴斯奉献了牺牲，这才使它在第四天停了下来。或者这也许不是他们的力量，而是暴风自己停了下来。^①

他游览帖萨利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他看到的一个著名的峡谷是海神尼普顿造成的，他这样说：

在我看来这显然是地震的结果。很多人都认为地震是尼普顿造成的。

他本人对神的看法却需要我们去仔细探讨。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天堂的各种力量有很重要的作用，征兆、神谕、祈祷和预言对他来说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他的著作的开始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一段非常冷静、理智的声明，如此直截了当的理性的声明是十分少见的：

然而，从什么地方每一个神产生出来，或者是不是它们都一直存在着，他们的外形是怎样的，这一切可以说，是希腊人在不久之前才知道的。因为我认为，赫西奥德与荷马的时代比之我的时代不会早过四百年；是他们把诸神的家世教给希腊人，把它们的一些名字、尊容和技艺教给所有的人并且说出了它们的外形。^②

① 译文引自《历史》，第七卷，第191节。王以铸译。

② 译文引自《历史》，第二卷，第53节。王以铸译。

他的著作可以称的上是沟通两个时代的桥梁。他是在波希战争之后出生的，那是希腊的宗教情绪最浓厚的时代；他生活的年代是怀疑精神盛行的伯里克利的时代；而希罗多德凭着他温厚的宽容精神和热切的求知欲望和两个时代都契合无间。

历史学家经常会忘记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原本应当是人。条理清楚的事实和理性的分析倾向于掩盖人的本性。可是希罗多德并非如此。在他的作品中，人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应该感到幸运的是，马拉松、温泉关、萨拉米斯战役是由他记述下来的，这些名字和那些历史中的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战争比起来就像天上闪烁的星星。在希罗多德的笔下，这些战争变成了一部用最朴素的文字写成的宏大的戏剧中的一幕幕的场景。引起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傲慢和征服的欲望，另外一方面则是人们要抵抗强敌，保卫一切他们所珍视的东西。

希罗多德在《历史》的最后一部分才谈到了波希战争。这部书的前三分之二都在谈论希罗多德的旅行和他的旅行见闻。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往往越往下读就越觉得这本书的前几章就像是在徐徐展开的舞台背景。整个已知的世界就像是一幕背景，它恰如其分地映衬着自由和独裁之间发生的这场生死存亡的冲突，这场冲突将会决定西方是否将为东方所奴役。书中描写了那位伟大的国王大流士。他统治着大半个世界。无数的人侍候着他；他的财富不可胜数；他生活奢华无度；他的残忍暴虐令人难以想像。他就是东方的化身，我们从他的身上就可以看到那些不义之财，千百万无助的人民，对人命和苦难的麻木。希腊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希

罗多德书中提到的一个人对大流士这样说：“那是一个山多地少的穷国”，而那里的人民，如伯里克利所说的那样：“热爱俭约的美”；俭约，这正是浮华的东方那种穷奢极侈、糜费铺张的对立面。

当波斯士兵听说奥林匹克冠军的奖品只是一顶野橄榄枝编成的花冠的时候，他们觉得又可笑又惊讶，希罗多德在他的书中描述了他们的那种表情。他还记述了他看到的一根纪念柱，就是大流士经过一个他喜欢的地方建造的以志嘉许的那种纪念柱，这根纪念柱上刻着：“这里流出来的泉水是水中之秀，最好最美。人中之杰，最好最美的大流士到此一游。”因为强烈的对比，这些话使我们想起了在温泉关之战中死难的将士们的墓志铭：“陌生人啊，告诉拉喀德蒙人我们遵照他们的法律，长眠在这里。”

希罗多德从来没有强调过这种对比，但是这种对照如此鲜明地表现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中，他们根本用不着强调。“神离人很近，他们在观察公正和善良的行为，”赫西奥德这样写到，所有的希腊人也都这样相信。不管东方陌生的神明要求的是什么，那绝不会是公正和善良。希罗多德说“活埋人是波斯的风俗”。“有一次大流士的儿媳下令将出生于波斯名门望族的十四个儿童生生活埋。”罗马帝国总是倾向于东方的办法，他们同样采取了这种将孩子和老人一起杀死的习俗。那些童男幼女，要么被活埋，要么和他们获罪的父亲一同处死。但是希腊则不同。列奥尼达在温泉关战役中阵亡之后，斯巴达军队由另一名将军统领，一个将自己城邦献给波斯人的叛徒的几个孩子被带到了他的面前，这位将军把他们全部

释放了。希罗多德记下他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还是些孩子，他们的父亲把城献给波斯人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这位斯巴达将军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他相信无辜的人不应该受到犯罪的人的株连；更为基本的是他坚信每个人的价值，不管他们多么弱小而不能自卫。东方社会就从来没有过这种观念，甚至在最表层的生活也看不到任何这种观念的痕迹。这种观念也得不到任何法律或者习俗的支持。在希腊，这种信念则基于比法律和习俗更为深层的东西。希罗多德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科林斯的执政党派了十个人到一个人家里去杀一个男孩，因为有神谕说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将会毁灭这个城市。

那孩子的母亲以为这些人只是善意的来访，所以当他们说想看看孩子的时候，她就把孩子抱出来，递到他们其中一个人的怀里。他们在来的路上已经商定，不论谁第一个接过这个孩子，就要立刻把他摔死在地上。可是碰巧这第一个人在接过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笑了一下，所以他就下不了手，于是把他送到了第二个人的怀里。孩子在十个人的怀里传了一圈，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杀死这个孩子。于是他们就把孩子又送回到母亲的怀里，他们告辞出来，大家开始互相指责，特别是抱怨第一个接过孩子的那个人。

希罗多德这样说：“暴君破坏古老的法律，奸淫妇女，不经审判就杀人。但是人民的统治——首先，这个名字本身就是这样的动听；第二，人民从来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在东方各地，人们只知道暴君的名声。有一次，大流士率领部队

进军希腊，在路上，一个豪富的吕底亚贵族不但盛宴款待了他和他的群臣，还有他那大队的人马。希罗多德记述他准备了极为丰盛的酒宴，然后他谦卑地对大流士说，他的五个儿子都在军中服役，他希望留一个在身边，而大流士说：“你敢提出这样的请求？你是我的奴仆，应该把你的一切都献给我，甚至你的妻子。”他下令把富豪的大儿子腰斩两段，然后把尸体放在他的大军路过的道路两旁。波斯人都是奴隶，他们有奴隶之名，也有奴隶之实；权倾一时和富甲天下的人也还是什么权利都没有，他们的所有的一切都要听凭君王的处置。希罗多德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一个享皇恩多年而后又失宠的朝臣，应邀去赴皇宴。他吃完了摆在他面前的肉，然后有人将一只盖着盖儿的篮子放到他的面前，他揭开盖子一看，篮子里放着的是他的独生子的头颅和双手双足。国王轻松地问他，“你现在知道你刚才吃的是什么东西的肉了吗？”这位父亲深知作为一个奴隶他必须要能控制自我。于是他泰然地说：“是的，我知道了——只要陛下感到高兴，我就感到高兴。”这就是始自远古时代的东方的精神，希罗多德第一个将其书之于文，留传后世。希腊疆域狭小、生活穷困、土地贫瘠，但希腊是自由的。希罗多德的书中记述了一个波斯官员劝说几个希腊人归降薛西斯，希腊人对他说：“你很清楚做一个奴隶是什么滋味，可你还没有尝过自由的滋味，不知道自由是多么美好。如果你知道的话，你现在就会激励我们拿起我们的长矛，甚至拿起斧头，去为自由而战。”在希罗多德的书中，随着波希战争越来越近，我们就越感到这场战争不是血肉之争，而是两种不相调和的精神力量之间的较量。

波希战争之前有一个小小的序曲。小亚细亚沿海的几个希腊城邦爆发了暴乱，反抗大流士的统治。雅典派兵来增援。雅典人占领了吕底亚的首都萨尔迪斯，然后将这个繁荣的城市付之一炬。大流士无法相信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敢和他公然作对。他问手下的群臣：“雅典人是些什么人？”然后他命令手下人每次他用膳的时候都要提醒他三次：“陛下，不要忘了雅典人。”毫无疑问，希罗多德清楚怎样产生戏剧效果。他为马拉松战役布置好了舞台背景。

当大幕拉起，正剧开始的时候，大流士的侄子肩负着为国王报仇雪恨的使命，带领着波斯大军从海陆两路挺进希腊。他派出的使节先行前往各个希腊城邦索要“土和水”，一路上，他所向无敌，一直到南方的底比斯城邦都向他们奉献了这象征屈服的礼品。和雅典一衣带水的城邦埃列特里亚拒绝臣服，但她很快就陷落了，旋即被夷为平地。然后波斯大军直逼雅典。对那位宇内无双的国王来说，雅典可以说是微不足道。除了以前曾受恩于雅典的普拉蒂亚派来了一小队人马，整个希腊没有任何其他城邦派兵来支援雅典。希腊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南方的斯巴达人，他们同雅典一样决不会屈服于波斯，雅典可以与其结成一个坚强的同盟。但是，正像任何其他的主权一样，雅典用了很长时间才作出了计划。当费迪皮迪兹开始四处求救的时候，波斯人几乎已经是大兵压境。第二天，他到了斯巴达，催促道：“拉喀德蒙人啊，雅典人恳求你们，不要让他们受到野蛮人的奴役。”但是当时还要等好几天才可见满月，而斯巴达人不到月圆的日子是绝不会发兵的。斯巴达人告诉来求救兵的人说：“月圆之后我们会立即发

兵。”但战事却不会等待月圆的。波斯人的战舰已经停泊在马拉松曲曲弯弯的港湾之中。

希罗多德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他肯定经常听到身经此战的人们讲起这场战争。他把希腊的战略计划讲述得非常清楚。波斯人把他们的精锐部队部署在中路，而他们的两翼都是一些老弱残兵；雅典人排兵部阵的方法正好与波斯人相反，米太雅德把他的精锐部队放在了两翼。他的中路却很空虚，所以波斯人在中路轻而易举大获全胜，并乘胜追击，然后雅典的军队就从两翼包抄过来，切断了波斯人和他们的战舰之间的联系，并将他们一举歼灭。雅典最终大获全胜。波斯舰队曾靠近得可以看见雅典城，此时便立即掉头返航逃跑了。这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斗，也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雅典人怎能以寡敌众，以弱胜强？我们不能理解，可是希罗多德能够理解，所有希腊人也都能够理解。这是民主制度对建立在奴隶基础之上的集权制度的胜利。稍早些时候的马拉松战役中，雅典人冲锋时争先恐后；而敌方的士兵却是在军官的皮鞭的驱使下才走上战场。仅仅靠兵多将广难以抵挡自由人为捍卫他们的自由而战的那种必胜的精神。自由显示了它自己的力量。整个雅典城中洋溢着高昂的斗志和效忠祖国的气氛，雅典开始崛起。

十年之后，这场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拉开了帷幕。大流士曾经发誓要与希腊再决雌雄，以雪败战之仇，可他到死也没有实现这个誓言。复仇的任务落到了他的儿子薛西斯的肩上。可他也注定要永远记住雅典人。薛西斯对复仇并不热切。

可实际上他没有办法。命运注定他必须去报仇雪恨。波斯的国力此时已经十分强大，他们此时也十分自信。最痛恨炫耀武力的神将惩罚他们。时间到了，这个强大的帝国该分崩离析、衰落消亡了。希罗多德说过，横蛮的自信迟早会垂头丧气，埃斯库罗斯也写下了这样的话：

所有的傲慢收获的将是泪水。

神明最终将和人们清算

他们的傲慢欠下的账。

上天托了一些虚梦给薛西斯，激起了他的野心，他决定要征服希腊。希罗多德用严肃的笔调描写了他为进军希腊所做的准备：他逐步扩充兵力，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一片广阔的地峡和赫勒斯滂之间挖掘了一条大运河，为海上运输和陆路运输提供了一条方便的通道；他征集了大量的粮草，并派人四处去寻找水源；他在进军的沿途准备了大量的军需物资。然后大军开拔，上天也有所垂示。军队开始行进的时候，“太阳退下了它在天上的宝座，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而天上既没有云彩，空气也清新无比”。现在科学证明日食的出现是在波斯大军开始出征的两年之后，可希罗多德那个时候才仅仅十岁，不可能十分精确地记录日期。希罗多德的材料来自一些老年人的叙述，而在希腊，人们普遍相信某种戏剧性的契合，这些老人难免会把太阳的突然消失和强大的波斯帝国的衰落联系起来。

军队行进到赫勒斯滂的时候，便停止前进，接受国王的检阅。国王坐在白色大理石的座椅上，望着漫山遍野的军队，还有布满了整个海面的无数的战舰，不禁潸然泪下，他对旁

边的一个人说：“想到人生如此短暂，看到眼前这众多的将士命中注定即将战死，我忽然有一种怜悯之情。”旁边的人答道：“陛下，不然。虽然人生短暂，但是古往今来，人皆求有数死而不愿有数生，陛下伤心落泪，不若为此。”

波斯大军继续向希腊挺进，士兵们一路上竟喝干了河流中的水。他们所向披靡，沿路上的许多城邦向他们进献了土和水，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沦为波斯人的奴隶。雅典人没有屈服。可是他们也感到恐惧，感到无望。德尔菲的神谕告诉雅典的使者说他们最好逃到大地的边缘，并且要适应充满恐惧的生活。可是，希腊人仍没有屈服。他们好像毫无取胜的希望。斯巴达人同希腊人一样决心抵抗到底，可是他们的策略却缺乏远见。他们的心中只是想保卫伯罗奔尼撒半岛；开始的时候他们拒绝考虑任何其他意见。可雅典人仍立场坚定。薛西斯的将军派了一名大使来到雅典，他们提出了最宽厚的条件，所有的条件都很合理，只是没有自由。希腊人的回答是：“回去告诉你们的将军，就说希腊人说，只要太阳还像现在这样朝升暮落，我们就绝不会和薛西斯和解。”如果人们的精神坚定不移，奇迹就会发生。

斯巴达人终于下定了决心。他们派了一小队人马到北方去守卫温泉关，这个关隘是波斯人的必经之路。这是一场长时间的英勇的战斗，可最后斯巴达仍以失败告终。斯巴达的守军将领列奥尼达让那些和他并肩作战的其他城邦的希腊士兵撤离，希罗多德说，“因为他觉得，这些人不应该死去，可是他自己和其他的斯巴达将士却不会弃城而走，因为他觉得那是很令人羞耻的事情”。他们等待着敌人的攻击，他们知道

这是最后一战了，有一个人说他听说波斯的士兵不计其数，他们射出的箭遮天蔽日。另一个人说：“好啊，那我们就可以在阴凉下战斗了。”这样的士兵在倒下之前必定会先给敌军以重创。希罗多德描写他们“他们从掩护过他们的堡垒中冲出来，好像是要冲向死亡。但是对面波斯军队的军官在用鞭子逼迫他们的士兵前进，这就是温泉关战役的情形。”当战斗结束以后，薛西斯亲自来视察战场，他望着遍野横尸，他叫过他的随从队伍中的一个被流放的希腊人。他问：“你告诉我，我们怎样才能征服这些人？”可是没有人能够告诉他。

雅典人弃城入海。德尔菲的女祭司又说话了。“宙斯赐给帕拉斯·雅典娜一堵木墙，”她说：“这堵木墙将会保护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这个神谕传下来的时候，人们激烈地争论起它的意义来，可是，希罗多德说：“一位最近才显露头角的名叫地米斯托克利的人的说法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同。”这个人说木墙指的就是船，所有的人都应该逃离这个城市。妇女和孩子们被送到了安全的地方；舰队开到了萨拉米斯，所有剩下的希腊人都聚集在那里。雅典的力量最为强大，所以就被推举为领导者，但如果他们看到他们的主张会遭到其他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就从来不强行推行他们的主张。希罗多德说，“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拯救希腊”，而不是得到他们显然应该得到的荣誉。他们毫无怨言地退让了，让他们的竞争对手斯巴达人来领导大家。这是雅典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如果他们一直能够牢记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什么不是，那么也就不会有伯罗奔尼撒战争了。

即便如此，胜利最终还是属于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他

作出了一个作战计划，迫使波斯人在萨拉米斯周围的狭窄的水域内作战，这样他们在数量上的优势反而成了他们战败的原因。薛西斯站在岸边观战：

国王坐在山顶突出的岩石之上
注视着海边的萨拉米斯，
海上的万船千帆，
还有他来自各地的士兵战将。
他在清晨清点士兵的数量，
可到日落的时候，他们又身在何方？

得胜的希腊人无法相信他们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他们几乎都是怀着绝望的心情准备背水一战。希罗多德说：“就在前一夜，他们每个人还都怀着恐惧和沮丧的心情。”他们不能相信敌人可怕的威胁已经结束了。他们为敌人下一次的攻击做好了准备。但是波斯人的战舰远去了，他们一去不复返了。自由再一次显示它的力量。就在这次战争之前希腊的将领告诉他们的士兵：“当你们和波斯人作战的时候，你们首先要想到自由。”埃斯库罗斯亲眼目睹了这次战斗，他说，他们奋勇向前，口中高呼：

为了自由，希腊的子孙们，
为了国家、子女、妻子的自由，
为了信仰自由，为了祖先的陵墓。

当这些胜利者们看着敌人的强大的军队败退的时候，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对神明的敬畏。地米斯托克利说：“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功绩。”

第九章 修昔底德

过去如此的，将来也仍如此

欧洲最强大的海军和最强大的陆军之间掀起了一场战争。他们都想取得欧洲的霸主地位。他们都想通过这场战争来削弱对方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力量：称霸海上的一方希望巩固她疆域广阔的帝国，而陆军强大的一方则要推翻这个帝国，然后建立起一个新的帝国。战争开始以后，交战的双方都意识到某个亚洲国家可能是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个亚洲国家疆土广阔，在欧洲也有它的据点，很多人都相信它很乐意坐看鹬蚌相争，等到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它再来一举统治整个欧洲。

那是在公元前 431 年，当时雅典的海上力量天下无敌，而斯巴达则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此时波斯意识到只要在两者之间挑起一场战争，它根本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坐收渔利。

当今的历史学家通常会反对历史是重复的、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借鉴和指导的说法。现代的科学历史学家对他们的研究对象的想法和地质学家颇有相似之处。历史是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下来的一些分立的事实。时间这部织机编织出来的历史长绢没有一定的花式，除了可以从中取得一些

信息之外，研究历史没有其他的意义。但这位撰述雅典和斯巴达之战的希腊历史学家不是这样看待问题的，可是他辉煌的巨著仍是历史学的经典作品。假如修昔底德对研究历史所持的态度和现代历史学家一样，那他绝对不会写他的历史。希腊人对知识本身并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是注重实际的人。他们渴求知识是因为知识对生活有价值；它能指引人们避歧途而入正轨。修昔底德撰写他的历史著作，因为他相信人们可以从了解那场毁灭性的战争的起因中获益，正如人们可以从知道什么东西能使人得上致命的疾病之中获益一样。他推断说，既然人的头脑本质的变化不比人的身体本质变化大，那么人能够支配的环境就会不断重复，而且在同样的条件下人们也必然会采取同样的举措，除非他们能够知道此前曾有同样的举措以灾难而告终。当人们知道了灾难的起因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设法避免这种灾难。他说：“人们可能会因为这本书缺乏故事性而觉得它不能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它能对那些想知道那些曾经发生过、而且根据人的本性来说还会同样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最朴素的事实的人能有所裨益的话，我就会感到满足。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此时片刻，而是为了将来永远。”

修昔底德认为这就是历史学家的使命，他记述的就是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在战争刚开始的几年中，他是雅典的一名将军。然后，命运安排他由一名战士变成了一名旁观者，因为在战争进行到第十年的时候，他遭到了流放。他告诉了我们其中的缘故：

将军派人去找本区的另一位指挥官，欧罗洛斯的儿

子，这部历史的作者修昔底德，催促他立即前来支援，他当时距离安菲波利斯有半天海上路程。他召集当时能找到的七艘战船马上出发了，希望能在安菲波利斯投降之前到达那里。但是公民们停止了抵抗。同一天晚上修昔底德和他的战船开到了。

他到达该城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照雅典人的规矩，失职的将军就要受到惩罚，从那时开始，修昔底德就成了一名旁观者。他说：“正因为我的流放，我能够静静地观察事情的发展。”

虽然他的陈述异乎寻常，可他的著作证明事实确实如此。他从一个国家最信任的人变成了一个没有祖国的人，这在当时比死强不了多少。另外，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他的所作所为也不应该受此重罚，但是他仍能“静静地观察事情的发展”，没有任何的愤愤不平，没有任何的偏见，他写出的历史那样冷静而公平，好像他写的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他将雅典和斯巴达等同看待，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一点的臧否裁量。他的头脑中想的是比他正在记述的这场毁灭性的战争还要高远的东西。他看到了他记录的事件的永恒的一面。在两个希腊城邦之间的斗争形势不断变幻，在斗争的表面现象之下，他看到了永恒不变的真理。他的书从头到尾，从那些没完没了的关于海上和陆路的一丝不苟的描写中，他指出了战争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战争，战争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还有，除非人类能够学会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战争仍旧会继续。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实是一部专门讨论战争的起因和结果的著作。

这场战争爆发于公元前 431 年。战争的起因是一系列的

小纠纷，这些小纠纷即使全加在一起，也不应该导致希腊的两个最主要的城邦之间的生死之战。阿里斯托芬对之进行了嘲笑，他说这场战争的起因不过是雅典的喝醉了酒的年轻人到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并且

跑到墨伽拉（麦加拉）去，抢来了那个名叫西莲塔
的妓女。

想不到这一点鸡毛蒜皮，居然扫了墨伽拉（麦加拉）
人的面子，

惹动了他们的大蒜劲儿，他们反而抢了阿斯帕西亚
两个妓女，

好，为了三个娼妇，战火就在全希腊烧起来了。

我们的盖世英雄伯里克里斯（伯里克利）勃然大怒，
大发雷霆，大放闪电，震惊了全希腊；

他拟出一道命令，读起来就像一首酒令歌——^①

修昔底德没有去考虑阿里斯托芬嘲弄的这些东西。这场战争真正的起因不是这个或那个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是由于远方一个殖民地的反抗，也不是由于违背一个不太重要的条约或其他任何类似的问题。这场战争真正的起因和这些表面问题相距甚远，是深深地埋藏在人类的本性中的某种东西，而且这也是一切战争的起因。这种起因便是贪婪，也就是对权力和财产的不可思议的迷恋之情，这种迷恋是不管多么大的权力和多么丰厚的财富也满足不了的。修昔底德在书中说，权力，或者财产，使人们贪求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财产。雅典

① 译文引自《阿里斯托芬喜剧两种》，罗念生译。

和斯巴达争战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他们都太强大了，所以他们都被迫（修昔底德就是这样说的）去追求更大的权力。他们争战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同——而是因为他们太相像了。这场战争和他们之间观念上的分歧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出于任何正义与邪恶之类的考虑。民主制度是正义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是邪恶的吗？对修昔底德来说，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对问题的实质避而不谈。没有任何权力是正义的。权力，不管由谁来行使，都是邪恶的、陷人于不义的东西。

大约两百年后，有一位名叫波里比亚的历史学家，也是希腊人，他简明扼要地归纳出了修昔底德的主要观点。他说人类历史就是过分强大的权力的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轮回过程。这个轮回从远古的专制君王的时代就开始了。他们的权力越大，就越想获得更大的权力，他们也不断滥用自己的权力，直到人们无可避免地起来反抗，而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团结起来就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够推翻暴君，自己掌握权力。但他们也同样永不知满足。他们也不断地侵蚀别人的利益，直到他们自己也被人推翻。然后人民起来反抗他们，民主制度代替了寡头统治。可是所有的权力的邪恶还是一样的。它引起腐败和对法律的不屑，直到最后国家已无法再正常运转，而这时就会有一个强人出来说他能够恢复秩序。独裁制度，寡头制度，民主制度依次遭到推翻，因为在它们都同样具有一种不变的邪恶本质——那就是对权力的贪欲——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种统治必然是有道德品质的。

修昔底德看到的这次权力的轮回造成了如此可怕的后果，

他相信他应当把这次战争记录下来，这将会是任何人都不能无视的警钟。人们首先应该注意的事实，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更加清晰地表现了出来，那就是强权将会导致其本身的毁灭。雅典人建立的辉煌的帝国最后化为一片废墟。雅典人富有的海上帝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被看做是强权政治的典范。实际上她却是变得过于强大了。她走上了她必然要走的道路，这条道路也给她带来必然的后果；她滥用了她的权力，也遭受了灭顶之灾。修昔底德就是这样看的。

我们能够看得更远一些。人性的伟业被击败了。希腊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停顿了，不久就终止了。一直等到几百年之后，人们才能接续上希腊思想的断点。

公元前六世纪的初期，也就是修昔底德所记述的战争开始前150年，我们所了解的雅典诞生了。最初，雅典是一个很小的国家，由一些有土地的贵族来统治，随着贸易的发展，这些贵族逐渐聚敛了大量的财富。那时候很少发生战争。直到公元前五世纪，所有的战争都是城邦之内的战争，而当时在雅典城内，人权的观念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旧秩序已经式微。公元前六世纪之初，雅典出现了一位伟大而善良的人，他就是梭伦，他真的可以称为一个伟大善良的人，从不为自己谋取私权，这真是雅典的福气。他像修昔底德一样敏锐地发现权力产生罪恶，而贪婪是它的根源和动力。他说：“人们在贪欲的驱使下，争相谋求不义之财，最富有的人永远贪求更多的财富。”谈到权力的时候他说：“强权的人将毁灭这个城市。”在一个希腊人的口中，再也没有比这更厉害的诅咒了，因为当时他同每个人一样都完全依赖于自己的城邦。梭

梭伦根据那个时代的最新精神改造了雅典政府，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借此为世界上第一个民主政府奠定了基础。确实，他辞职之后，一个政治强人通过阶级之间的暴力争端取得了利益，但总的来说他们仍旧尊敬梭伦的宪法。甚至在独裁统治之下，雅典的民主政治也在继续发展，并且和她相邻的城邦和平相处。的确，雅典从一个邻邦麦加拉夺取了重要的岛屿萨拉米斯，而且策划这次战争的不是别人，正是梭伦本人；但是这样的事情也仅此一件而已。

这对雅典来说是有利的。不几年，雅典的独裁统治被推翻之后，在公元前 490 年这个值得纪念的重要年份里，雅典必须要决定是和波斯作战，还是为人所奴役，这时候，她已经不再需要分心去防范希腊境内的敌人了。再也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比波希之战的战争动机更为纯粹的了。马拉松和萨拉米斯这些名字“对后世的人来说，仍旧是有力的挑战”。取得这些战役的胜利对后世的人来说仍旧像是一个奇迹，甚至对当时参加那些战役的人来说也是一样。强权者被人们从他们的宝座上推了下来，那些普通的人们在欢呼，此后的五十多年里，波斯人对希腊无计可施。

这场战争之后，雅典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人文精神的复兴。将人区分开来的种种令人痛恨的差别被抛开了，到处充满了自由的气氛，这里指的是广义的自由，不仅仅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还包括思想和言论自由。那么，我们自然会认为无论怎么说，在这个悲哀苦难的世界中：

在那时候，活着就是快乐的。

但修昔底德的书中没有欢乐。雅典在很短的时间之后就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引用两段文字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清愿的妇女》（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欧里庇得斯早期的戏剧，我也认为确实如此）一剧刚开始，阿尔戈斯派兵远征底比斯，遭到了失败，而底比斯人做了一件令所有的希腊人都感到难以容忍的事：他们不允许敌方埋葬他们战死的将士。他们的首领来到雅典来求援，他对雅典的国王忒修斯说：“因为雅典在所有的城邦中是最富有同情心的。”忒修斯有些踌躇是不是要卷入这场争端，因为不管这件事情多么正义，这毕竟是另一个国家的事，这时候他的母亲对他说，这是他的责任。雅典城和他本人的荣誉都系于此。

请遵循神的旨意办理。

你该知道，帮助受伤害的人，

惩治违反法律的人，都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

除了尊重是非对错的基本原则，

还有什么能使一国与别国联系在一起？

忒修斯承认他母亲说的是对的。雅典是无助者的保护者，是压迫者的敌人。不论她到何处，自由总是跟随着她。

仅仅几年之后，修昔底德就通过他最理想的政治家伯里克利警告雅典人说：

你们不要认为我们战争的目的单单是为了享受自由或遭受奴役的问题；同时也牵涉到帝国的丧失以及管理这个帝国时所引起的仇恨而产生的危险。虽然也许有些在突然恐慌状况中，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真的认为放弃了这个帝国是一种好的和高尚的事，但是你们已经不可能放弃这个帝国了。事实上你们是靠暴力维持这个帝国

的：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放弃这个帝国是危险的。^①

雅典人的这两种观念之间真有天壤之别。不能用诗人和历史学家之间的差别来解释这两种观念之间的差别。欧里庇得斯像修昔底德一样地了解这个世界。没有多少人比他们对这个世界了解得更为透彻。发生了变化的是雅典人。这两个人都是他们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代言人。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以自由而蜚声于世的都市却得了一个僭主之城的名声。

回溯到公元前480年，雅典在战胜波斯人之后被推举为希腊自由城邦联盟的领袖。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位，雅典人对此也一直引以为荣，但是，这个职位需要高度的公正无私。雅典只有将所有其他城邦的利益与其本身的利益同等对待，她才能成为联盟的领袖。在波希之战中她确实如此。她在危难之中不是汲汲于自身的安危，而是表现得高贵、大度，这正是欧里庇得斯眼中所看见的雅典。作为联盟的领袖，在一段时间之内她也确实没有因为自己的权力而走向腐化。但是这段时间并不很长。更大的权力的诱惑如常是不可抗拒的。不久之后，希腊自由联盟变成了雅典帝国。其间颇多变故，甚至是巨大的变故，虽然这些变故没有影响到这个民族的性格，但是却对人们的信仰和道德基础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对那些参加波希之战的人来说，他们取得的巨大的胜利证明了他们的一个信念，那就是神圣的正义统治着这个世界。

① 译文引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六章，谢德风译。

它确实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在起作用；然而，那些践踏别人权力的人最终要受到惩罚，不管他们是多么强大，也不管他是个人还是一个国家。产生于权力意识的妄自尊大是希腊人最为痛恨的邪恶品质。在希腊早期的文学作品之中，在所有的故事和神话中，个人的这种邪恶品质都会触犯神怒，而他们看到一个国家如果具有这种品质，就会像强大傲慢的波斯帝国一样遭到萨拉米斯那样惨重的失败。他们伟大的领导者梭伦曾经说过尘世的正义反映了天堂的正义。伟大的诗人埃斯库罗斯这样写道：

金钱从来不是一个堡垒，
冒犯神的正义的祭坛的人，
永远得不到保护。

但是随着雅典将她的盟友变成了她的臣民，这些信念被一股逐渐高涨起来的金钱和财富的浪潮一扫而光。对这个帝国的年轻人来说，事实证明那些旧的信念是虚假的。在他们看来，金钱实际上是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他们当然会看到他们的城邦因为侵害其他的城邦逐渐强盛起来。那么，正义的神圣力量又在什么地方呢？一个人如果去侵害一个与己无害的人，有什么东西会使他感到恐惧呢？修昔底德和他同时代的人为什么还要相信善恶有报？伯里克利时代的年轻人只需要睁开他们的眼睛，就能够解脱把避邪恶和得平安视为一事的信念。一个利用一切可能去损人利己的人显然最不会害怕被雷电劈死。突然之间，在辉煌的、无可战胜的雅典，行善的动机不存在了，对恶行终有恶报的恐惧也消失了。而当时那些杰出的年轻人，野心勃勃，以富为荣，心中却没有什

么东西能代替善恶因果消失后留下的空白。的确，他们仍旧蜂拥着前去观看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但他们费尽心思也看不懂。他们也去看《奥瑞斯忒斯》，可是丝毫也没有意识到喜剧作者向他们展示的善的无穷力量，他们也为《安提戈涅》鼓掌欢呼，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看到的是公正无私的行动的崇高的美。

在这个辉煌而腐朽的城市中，有一个人看到了这个巨大的变化。修昔底德看到了所有道德的基础，也就是对别人的权利的尊重已经崩溃、荡然无存了。当欧里庇得斯写《请愿的妇女》的时候，尊重他人的权利在雅典是人所共守的原则，不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如此，城邦与城邦之间的交往也是如此。城邦就是一个高贵的个人的化身。但到了修昔底德写作的时代，雅典人已经抛弃了这种原则，从而建立了一个帝国。在一个庞大的强权政治的运作中，一个国家利用一切可能来谋求自身的利益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正确的。修昔底德不但可能是第一个意识到这种观念，而且肯定是第一个人将这个成为后世的原则的观念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人。在他的书中，伯里克利明确地否定平等相待和互相理解对国家和对个人同样重要。他指出，一个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将这条道路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国家可以遵循这种观念，但对一个希望一统天下的国家来说则必须抛弃这种观念。他说：“一个统治帝国的城邦不承认任何与其本身的利益相违背的东西是正义而且理智的。”

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雅典的精神。雅典帝国不断增强的力量激起了他最有力的竞争对手的反抗。斯巴达起

而与雅典开战交锋。

所有的读者开始读修昔底德之前都对雅典有某种偏好。斯巴达人在艺术、文学或科学诸方面没有给后世留下任何东西。然而我们必须说斯巴达人的理想从那时起就不绝如缕，一直流传到现在，那是一种本能的展现，虽经两千年的岁月却几乎丝毫没有减弱。那不是成年人的理想。斯巴达人像小学生一样看待事物，和吉卜林的小说《斯托基公司》非常相似。一个标准的斯巴达人应该是一个勇猛的、面对艰难和痛苦不改颜色的人，还应该是第一流的运动员。话说得越少越好，甚至不如说，想得越少越好。他们强调不要去问为什么，而总是去做，一直到死。他们是些勇士，此外什么也不是。斯巴达城邦的目标就是战争。雅典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和他们对待其他一切事物的态度都是现实的。他们从来没觉得战死沙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修昔底德记述了伯里克利所做的一篇纪念在战争中死去的战士的演讲，在他的演讲中他没有鼓励他的听众们去效仿那些死去的战士，而是要他们祈祷如果他们参加战斗的话，不要陷入那么危险的境地。在雅典，战争不是一件好事。然而战争确实是必要的；它是一个城邦夺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或保有已经夺取的东西的惟一的途径。战争当然是非常有利可图的。

斯巴达人对战争的看法是从情感上，而不是从利益上考虑的。战争绝不意味着罪恶；战争是人类最高尚的活动形式。他们对战场有一股迷恋之情。他们所喜爱的诗人提尔泰奥斯完美地表达了他们这种浪漫情绪。他的一首诗达到了即使军营诗人也很难表达出来的强烈的情感，他在诗中说：

这年轻人健美的身姿在他死去的片刻最是美丽。
甚至在他死后他仍旧动人无比，
这勇敢的年轻人在他生命最灿烂的时刻死去。
他在男人们的遗憾、女人们的泪水之中获得永生。
此刻他最美丽，而且比他活着还要神圣，
因为他在战场上消逝离去。

斯巴达的年轻人所受的训练就是要使他们明确，他们的使命就是保持城邦的威力，并放弃任何与这个目的没有直接关系的東西。生活中所有其他的可能——幻想、对美的热爱以及文化方面的兴趣都被抛到了一边。人生一切志向和努力的目标就是要使自己的祖国更加强大。凡是有利于国家的才是好的；凡是有害于国家的才是坏的。一个斯巴达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部运行良好的机器中的一个部件，这部机器对他负有一切责任，要求他绝对的服从，并因此造就了他的性格和他的思想，而且在他的内心深处铭刻下了这样的信念：男人的最终目标就是杀死别人或者是被别人杀死。普鲁塔克写道：

在斯巴达，公民的生活方式是固定不变的。总的来说，他们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过一种属于个人的生活。他们就像一群蜜蜂围绕着蜂王聚集在一起，怀着满腔热情和无私的抱负，完全属于他们的国家。

雅典是一个民主政体。所有雅典人都是国民大会的成员，它是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权力的执行机构是五百人议会，每一个公民都有资格参加这个议会。官员通过抽签或者是公民选举决定。

城邦不对雅典公民个人负责；个人须对城邦负责。因此，雅典人的城邦概念和斯巴达人自然是不同的。雅典人从来不认为城邦是一个什么神秘的实体，也不认为它与组成城邦的公民有什么不同，或是比它的公民要高出一等。雅典人的现实精神使他们绝对不会那么认为。雅典的城邦概念是一个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所有的公民自由地去发挥他们自己的能力，按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他们惟一需要服从的只是他们自己通过的并可以随其意愿修改的法律。但是在这种对法律很不稳定的看法下面蕴藏的雅典独有的信念，却主宰着公元前五世纪的艺术领域——雅典认为那些无限制的、无约束的、非法的东西是野蛮的、丑恶的、不理性的。由自我控制来严格限制的自由——这是雅典鼎盛时期的信念。雅典的艺术家体现出了这种信念，它的民主体制却没有。雅典的艺术和雅典的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雅典的民主制度却蜕变成了君主统治，最后陷于失败。

事实证明，独裁统治在战争中表现得更为有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的不断深入，雅典的民主政府和纪律严明、目标明确的斯巴达的政权比起来就越来越显得软弱无力。雅典采取的策略随着当政者的选择而摇摆不定。亚西比德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人虽无操守，却足智多谋，苏格拉底曾对他寄予厚望，他说服了雅典人派一支远征军去征服西西里。他有出类拔萃的领导能力，这次远征在他的领导之下本来有可能成功，可是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其中的原因当然是由于这次行动执行得非常糟糕。雅典的舰队刚刚抵达西西里，亚西比德就被召回雅典，因为当时他的政敌指责他亵渎神明，因

此民众对他的指责也甚嚣尘上。他深知一群狂热的卫教士对一个典型的不信教的人会采取什么做法，便索性转而效忠斯巴达，并屡建功绩。

远征西西里的行动完全是因为领导不善而告失败。进攻西西里的雅典指挥官的能力根本不足以担此重任。他的指挥策略乏善可陈。他们低估了敌人的力量，待到明白过来则为时已晚。他们过于迷信自己的海军力量，并因此遭受惨败。在叙拉古附近进行的海上决战中，雅典强大的海军中了敌人的计谋，一溃千里。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雅典军队弃船而逃，他们在没有任何食物和给养的情况下从陆路溃逃。经过几天的艰苦跋涉，绝望、饥饿、疲劳的雅典军队溃散了；他们的前锋和后卫失去了联系，叙拉古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们各个击破。在这场战争的最后，雅典残余的部队逃到了一条河边，饥渴如狂的士兵立即奔到河边去喝水，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甚至也完全不顾及敌人已经包围了上来。河水很快就被鲜血染红了，但是雅典的士兵们仍旧发疯似地涌向河边，他们一边喝着血水一边死去了。

所有被活捉的人全部发配为奴。他们之中大部分的人被发往叙拉古附近的采石场去做苦力，在那里大自然就给了他们艰苦的磨难，根本不再需要人来参与了。在白天的酷暑和夜晚的严寒的折磨之下，没有多少人生存下来。修昔底德为他们撰写了墓志铭：“做了人能做的事，受了人该受的苦。”

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大失败。后世的国家在发动战争的时候，都曾经希望使敌人遭受像雅典人在西西里遭到的那样沉重的打击。但这还不是雅典在这场战争中遭受到的最惨重

的灾难。修昔底德的史册中的高潮是他对战争中雅典城邦中的人们遭受的苦难的描写。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最后四分五裂的画面。他通过两个故事说明了这个过程是多么的迅速，其中一个故事发生在战争初期，另一个则是在战争后期。第一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隶属于雅典的重要的岛屿上发生了叛乱。雅典派了一支舰队前去镇压这次叛乱，他们在狂怒之下投票决定杀死所有的男人，将所有的女人和孩子充为奴隶。在投票之前，他们的将军警告雅典人不要被雅典帝国的三个死敌引入歧途：怜悯、耽于清谈和公平相待的精神。他的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于是派了一条船去执行这个任务。然而，欧里庇得斯所说的希腊精神仍旧存在，雅典人醒悟过来了。他们派了第二条船去追赶第一条船，无论如何也要及时赶到岛上去阻止这场大屠杀。他们的心情是如此急迫，没有片刻的休息，以至于划船手们在吃饭的时候都不离开他们的岗位，终于及时赶到。

第二个故事也是关于一个反叛的岛屿，故事发生在七年之后。这次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小岛，叫做米洛斯，他们的要求也不过是想中立。但雅典在这七年之中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次她不需要人再来提醒她要避免怜悯和公平相待。希罗多德曾经说过，当雅典面临高尚和卑劣的选择的时候，她总是把高尚作为自己的选择。战争对这个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我们从修昔底德书中雅典使者和米洛斯人之间的对话正可以看出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

米洛斯人说他们没有做下任何错事，对他们发动战争违背所有正义的原则，雅典的使者回答他们说：“只有双方势均

力敌的时候才谈得上正义。强大的一方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而弱小的一方则付出他们必须付出的。”

米洛斯人回答说：“你忽略了正义，可正义对你们也是有利的，因为如果一旦你们被打败了的话，你们也就不可能要求得到正义了。”

雅典人说：“你必须让我们来冒这个险。我们的想法是让你们屈服于我们，而又不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况且这对你们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成为你们的奴隶吗？”米洛斯人问。

“对，这可能使你们免于陷入更糟的处境。”

“你们绝对不会同意我们继续保持和平，继续做你们的朋友而不是你们的同盟吗？”

“不，”雅典人回答说，“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友谊。那对我们来说正好显示了我们的软弱，而你们的憎恨则显示了我们的力量。请你们记住你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自保。我们比你强大。”

“命运不总是支持强大的一方，”米洛斯回答说，“如果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就可能有独立的希望。”

“说起希望，你们要小心”雅典人回答说：“不要像普通人那样，当实在的希望没有了，就转而相信像宗教这种不实在的希望。我们建议你们放弃这种愚蠢的想法。我们还想提醒你们在刚才我们的谈话中你们还没有提出一个注重实际的人应该提出的想法。”

米洛斯不是很实际的人，他们选择了战争。雅典人没用多少力气就攻克了这个小岛。他们将岛上的男人屠杀净尽，

把妇女和孩子充发为奴隶。雅典已经不再费心去用美丽的词藻来粉饰丑恶的事实，因为这些丑恶的事实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丑恶了。修昔底德说，邪恶这个时候已经被人当成了美德。词的意义都发生了变化：欺骗被赞为精明，鲁莽被当做勇敢，而忠诚、谦虚、大度却被认为是软弱的代名词。“善意本是高贵品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因素，现在遭到了嘲笑，销声匿迹了。每一个人都不相信任何其他的人。”这就是追权逐力最终给希腊人带来的后果。

斯巴达要好得多。她把战死疆场作为一种责任的理想肯定不会长时间让人感到满足，但至少也比雅典人在和米洛斯人的谈话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没有任何理想的情况要好得多。雅典在公元前 404 年陷落。激烈的派系之争分裂了这个城邦，而一向支持斯巴达人的雅典贵族小集团最后得势。权力之争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

下一个轮回甚至更快就来临了。斯巴达不可能统治其他的国家。雅典人统治的时候，除了对这些城邦重征赋税之外，并未对它们有任何其他干涉。一个羡慕斯巴达的雅典人解释了斯巴达人的统治方法，大意是说在任何斯巴达人的意志在他们的臣属国里都是绝对的法律。斯巴达人除了自己的治国方式之外不能理解任何其他方式，希腊其他地方的人对他们也并不很友好。他们都不是很驯顺的臣民，他们也不喜欢屈从。斯巴达人不可能长久地控制他们。斯巴达帝国支持了没有几年。在战争后期，斯巴达和她过去的头号敌人——波斯——缔结了联盟，波斯曾经大力帮助斯巴达攻克雅典。但是不久之后这两个盟友之间就开始频生龃龉。斯巴达人遭到了

失败，斯巴达人从雅典夺取的海上霸主地位落到了波斯人的手中。

这就是这次历经了 27 年的战争的结局。乍看起来，虽有胜者但胜得无趣，但实际上的情况却更糟。在这 27 年里，无数的雅典人在战争中丧生。幸运的是，一些适合参战年龄的男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修昔底德本人，还有很多同样声名赫赫的人没有死在战场上；但是毋庸置疑，那些确实战死沙场的人中有很多人本来能够使这个世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这些人没有死去、没有那么白白地死去的话，公元前五世纪在雅典燃烧的熊熊烈火，本来应该能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更多的光明。

所有这一切的罪恶都源于贪婪和野心引起的权欲。——修昔底德 III, 83

第十章 色诺芬

普通的雅典绅士

读完修昔底德再来读色诺芬令人有一种即愉快又奇怪的感觉。这两个人生于同一个时代，虽然色诺芬的年纪比修昔底德要小得多。他们都是雅典人，也都是战士；他们都曾经经历了战争，亲眼看着雅典遭到惨痛的失败。但他们却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甚至于让人觉得它们之间简直就不会有任何关系。修昔底德的世界是被战火摧毁的荒凉破碎、分崩离析的世界，在他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任何希望，幸福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色诺芬的世界却充满了欢乐，其中有着许多优雅和善的人，他们有许多愉快的事情来消磨光阴。比如，他们打猎。他为此写了一篇优美的散文：他写到他们早起出发时的愉快心情，在冬天白雪覆盖的大地上，带着像主人一样仔细搜寻猎物的猎犬；在春天“田野里到处开满了野花，花香对猎狗的嗅觉来说是很不利的”；或者追寻一只野鹿，这是一项很好的运动；或者是去猎野猪，这很危险，可是非常愉快、非常刺激。而猎手们得到如此丰厚的回报：他强健、年轻的体魄可以保持得比别人长得多；他比别人更勇敢，甚至还更可靠——虽然我们的作者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如此。一个打猎的人就是比不打猎的人好，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去看一看英国文学中描写的任何猎

狐的乡绅。狩猎是一项美好的、健康的、诚实的活动，一个能经常去打猎的年轻人是很幸运的。狩猎可以使他躲开城市的罪恶，使他热爱美德。

人们不禁要问，在修昔底德的书中，哪段时间是这些雅典人狩猎的时间呢？这位伟大的历史悲剧的作者是否曾经看过人们狩猎？他是否听人说起过那些人猎来的野猪有多大？那些狩猎者们一边欢饮，一边讲故事的晚宴，他是否参加过？我们完全无法想像他会参加这些活动，苏格拉底曾有一次参加色诺芬在场并加以记录的晚宴，我们也许可以设想苏格拉底也去参加那些狩猎人的晚宴，但即使能作此想，也无法想像修昔底德会出现在那种场合。此外，我们必然认为，比起阿伽同家里的聚会，苏格拉底参加的那种晚会是当时更风行的。阿伽同的客人都是雅典的精英人物，他们喜欢谈一些高雅的话题作为消遣。但在色诺芬记录的晚宴上，除了苏格拉底和他本人，其他的人都是一些普通百姓，他们肯定很快就会对《会饮篇》中那样的谈话内容感到厌倦的。但是没有任何人会对色诺芬描写的那种晚宴感到厌倦。那种场面自始至终都令人感到无比的愉快。当然席间也有一些高雅的谈话，苏格拉底肯定会如此；偶尔他们也会谈些非常严肃的内容，这些谈话甚至可能会吸引修昔底德的注意。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谈话都是那种令人愉快的晚宴中融合欢乐的气氛。比方说，苏格拉底说他宁可长现在这样扁平的鼻子，也不要高鼻梁，或是一个新婚的男人拒绝吃洋葱的时候，席间就会爆发出一阵阵的笑声。酒席间也会有音乐，苏格拉底会唱一支歌来给参加晚宴的客人助兴。一个兴高采烈的男孩演出了

一段愉快的插曲，而色诺芬对此的描写显示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切的感受力。这个男孩是应邀和他的父亲一起来的，他刚刚在雅典的一个重要节日上获得了少年组最重要的比赛的冠军，这的确是一项殊荣。他坐在他父亲的身旁，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人们想逗他活跃起来，可是他羞得一句话也不肯说，直到有一个人问他最为骄傲的东西是什么，有人叫道：“啊，当然是他获得的胜利了。”听见这句话他才突然红着脸说：“不，不是。”大家听见他终于开口了，都非常高兴，他们继续问他说：“不是？那你最为骄傲的是什么？”“是我的父亲。”他边说边朝父亲身边挤。在修昔底德认为一无是处的辉煌而腐朽的城邦中，色诺芬笔下的这个少年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图画。

像通常一样，主人准备了一些娱乐活动来招待宾客。一个姑娘为他们献上了新奇有趣的节目。其中最精彩的一出是她一边跳舞一边在空中同时舞动十二个圆环，随着音乐的节奏把这十二个圆环抛洒的上下翻飞。苏格拉底非常认真地看了这个姑娘的表演，他说他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仅是从这个姑娘身上，我的朋友们，而且从其他很多事情上，我都觉得女人的天份一点儿也不比男人差。”他还说，如果这些人之中有人愿意教妻子学些东西，那他会感到很高兴的。席间纷纷咕哝道“粘西比”，跟着有人大胆地问苏格拉底：“你自己为什么不教你的妻子一点儿好脾气？”苏格拉底回答说：“我一生最大的目标就是和人能融洽地相处，我之所以选择了粘西比，是因为如果我和她能够处好的话，我就能和任何人和睦地相处了。”所有在场的人对这个回答都感到非常满

意。

他们又漫无目的地闲谈了一会儿，最后他们谈到了运动上来，大家都饶有兴趣地听苏格拉底说他每天早上都跳舞以减轻体重。“的确如此，”有一个人插进来说，“我看见过他跳舞，当时我还以为他发疯了。可他告诉了我是怎么回事，我得说他的确说服了我。我回家之后——你们相信吗？我没有跳舞，因为我根本就不会跳，于是我就挥动胳膊乱舞一气。”然后大家就齐声叫道：“啊，苏格拉底，快跳一个给我们看看吧。”

这时那个跳舞的姑娘翻起了筋斗，然后头向前跃过了一个用剑架成的圆环。这让苏格拉底感到不高兴了。“这当然是很出色的表演，”他承认，“可是我们感到愉快吗？看着一个这么可爱的年轻姑娘冒这么大的危险？我没觉得这令人愉快。”其他的人都表示同意，然后这姑娘马上就放弃了这个节目，并和另外一个举止优雅的小伙子开始表演一出名叫《酒神营救被遗忘的阿里阿德涅》的哑剧，来代替刚才的节目。他们的表演令大家赞叹不已。这两个演员一句话都没有说，可他们的演技非常高超，仅仅通过手势和舞蹈就向观众清晰地表达出了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的情感。“他们完全不像是熟悉自己角色的演员，而就像是一对真正的情侣。”晚宴到此尽欢而散，苏格拉底与那个可爱的孩子和他的父亲一起回家。色诺芬在整篇文章中一直都没有提到他自己，除了在文章开始的时候说明他也参加了宴会，而且他认为高尚而且有道德的人在娱乐的时候的一言一行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才要写文章把晚宴上的这些事情都记录下来。我们只能遗憾

只有极少数的希腊作家像他一样写下这样的记录。

他还有另一篇记述雅典人日常生活的文章，这篇文章非常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这篇文章反映了雅典人的日常生活，而且还因为文中记述了古希腊妇女的一些情况，而妇女在任何历史时期的文章中都是很少出现的。一个新婚的小伙子在谈论他的妻子。他说，他们结婚时她还不到十五岁，从小就受到了令人羡慕的教育，她受的教育要她“尽可能地少看，少听，少问”。新娘纯洁的就像一张白纸一样，这位新郎很得意，因为他可以在纸上画任何东西。他心中清楚地知道该怎样开始。据色诺芬的记述，他是这样说的：“当然，我当时先得给她时间来逐渐地习惯我；然后，到了我们能够轻松地交谈的时候，我告诉她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很好地管理家务的主妇，说她负有很大的责任。可她很疑惑地对我说：‘可是，我的母亲告诉我，我自己是无足轻重的，只有你才是重要的。母亲对我说，我惟一要做的就是通情达理，要小心谨慎。’”她的丈夫抓住了这句话，因势利导，和蔼而郑重地向他的妻子解释她的生活从此都要小心和通情达理。她应该把家里收入的东西都妥善地保管起来；要注意监督每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监管仆人纺线、织布、做衣服；训练新的仆人，照顾病人。听到这儿，这位新娘的精神好像活跃了一些，她懦懦地说她觉得她喜欢照看生病的人。年轻的丈夫接着往下说。当然她得待在家里，他自己则喜欢早晨起来骑马到乡间去遛一圈——这项活动既健体又很令人愉快。但是一个女人到处乱跑则实在是不能体统。可是，她可以通过织布，或是铺床叠被，或是在监督女仆们工作来得到身体锻炼。和面做面包

据说是最好的运动。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增进她的健康，使她保持很好的气色——这样就可以使她对丈夫具有吸引力。化妆品一点好处也没有：当妻子涂涂抹抹的时候丈夫总是会觉察到，而他们却永远不会喜欢；妻子们脸上的红红白白的东西如果让丈夫觉察到的话，那是最令他们讨厌的，而他们是肯定会觉察到的。文章以一句欢快的话结了尾，“从那时起，我的妻子在每一方面都严格遵照我的话去做”。

我们很难想像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会有这样一个贤惠的妻子，会有这样一位幸福、自大的丈夫和他们整洁的家，我们同样也很难想像修昔底德坐在苏格拉底的身边，观看那个舞动圆环的姑娘跳舞的情形。想把色诺芬和修昔底德结合起来组成一幅和谐的画面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做惟一的后果就是我们再也无法看到他们任何一方陈述的真理。修昔底德所陈述的事实要深刻得多。他能在动荡的生活中发现不变的真理。他能够深深地挖掘出他所在的时代的邪恶，并且能够意识到这些邪恶的根源就是人性中那不变的邪恶本性。从斯巴达战胜雅典这一事实中，他看到了战争在检验各种价值观念中的作用，而且他意识到如果人类仍旧如此贪婪、仍旧如此贪恋权力，那么那些最重要东西的最终决定者必将仍是战争。他所了解的这些的确都是真理，而且这些事实没有任何改观的迹象，这实在让人感到无尽的悲哀。

但色诺芬描写的事实也是真实的。在遍遭战火洗劫的雅典确实也有一些愉快的聚会，有条有理的家舍，优雅的年轻人和快活的狩猎者。历史著作中从来不记录这样的愉快的小事，但是这些愉快的小事也有其重要意义。如果修昔底德的

描述包罗一切的话，那么整个希腊一定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毋庸置疑，色诺芬的思想水平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他考虑的不是永恒的真理。我们可以通过色诺芬的眼睛看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普通人的生活，而我们通过修昔底德或是柏拉图的眼睛却看不到。我们从色诺芬的笔下看不到修昔底德描写的那种黑暗、贪婪的雅典阴谋家；也同样看不到柏拉图设想的那种理想人物。他书中描写的人物都是一些普通的快乐的平民百姓，绝不在任何一个方向有极端的倾向，而且真实得绝对令人信服，就像色诺芬本人一样令人信服。下面就是他对一个人的生动的描绘：

他说他很久之前就意识到“我们自己应当知道我们必须做什么，并且要尽力去做，否则神会觉得我们没有理由繁荣昌盛。如果我们确实是聪明的，并且努力去做事，那么他会让我们其中的一些人兴旺起来，即使不是全部。抱着这样想法，当我向神祈祷健康和力量、祈祷雅典人的尊重、祈祷无损荣誉地增加我的财富、祈祷无损荣誉地在战争中免于死难的时候，我敬重神，并尽我的所能去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这些格外合乎情理的希望体现了希腊人的心声。说这些话的人和记载这些话的人都是典型的雅典绅士。我们可以从色诺芬的作品看到他的为人——他是一个好心人，通情达理，诚实善良，虔信宗教；他同样也是一个聪明的人，对各种想法理念感兴趣，他不是那种纯思辨型的人物，而是那种可以为某种合乎情理的、实际的善行努力工作的人。他的朋友也和他一样，他们都是典型的雅典绅士。

在另一种意义上，色诺芬也代表了他的时代。他的一生

中表现出广泛的兴趣，曾经从事多种不同的职业，这正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不同于其他人的特点。他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他父亲在阿提卡的家园到雅典来受教育，以脱离乡村的生活方式；他加入了苏格拉底他们的圈子，这个圈子里的老老小小都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疯狂地像着了魔一样地渴求知识，”或者像他自己说的：“都想成为善良优雅的人，懂得他们对于家庭、仆人、朋友和国家的责任。”他看到的苏格拉底不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总是在谈论“狂喜的灵魂所窥见的正义与智慧的灿烂景象，闪烁着纯洁的光辉”。或是任何类似的人。他看到的苏格拉底是一个严肃的思想者，一个学识丰富的常识的人。据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的记载，苏格拉底为他的年轻朋友们做的主要事情就是为他们安排日常事务提供实际的建议。他告诉一个年轻的军官怎样使他的士兵更有效率；他告诉一个为众多眷属所累的认真负责的小伙子怎样让她们去自己养活自己，等等。色诺芬被这种有实用价值的智慧所深深吸引。我们无从知道色诺芬的一生中，到底有多长时间是在这种愉快的谈话中度过的，但是当他放弃这种生活，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成为一名战士的时候，他还很年轻。他是真正属于他那个时代的，那个时候的诗人、剧作家和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战士、将军和探险家。

他在战争中去过很远的地方，看到了广阔的世界。他也弄到了足够的钱来供他度过余生，因为他俘虏了一个波斯贵族，得到了一大笔赎金。然后他就回到了希腊——不过是去了斯巴达，而不是雅典。奇怪的是，他在《长征记》一书中描绘出了民主理想的伟大成就，他自己却绝不是一个民主派。

他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的一生都保持着他的阶级信念。他一直都热爱斯巴达，而对雅典却总是疑心重重。即便如此，在他生命中最危难的时刻，当他和他的同伴们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刻，他的行为却像是一个真正的雅典人，他知道自由是什么，自由的人会创造怎样的成就。当万人大军推举他为将军，让他率领大家走出困境的时候，他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任何斯巴达人的措施。他成了一个民主的领袖，像一个我们能想像到的最自由的民主政体的领导者一样。他们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但这并没有使他的思想观点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改变阶级信仰的贵族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色诺芬再也没有回到雅典；实际上，回到希腊之后没几年，他就站在斯巴达一方和雅典作战，因此被雅典宣布为流放者。斯巴达人给了他一份风景优美的地产，坐落在离奥林匹亚不远的地方，他在那里住了许多年，每天骑马、打猎、经营农田，成了一个典型的乡村绅士。他在此间多有著述，内容涉及苏格拉底应邀参加的那些酒会，雅典的税收合理管理办法等等。除了两三篇之外，他所有的文章都很单调乏味；他的文章思路清晰、直截了当、明白晓畅，如此而已。然而散见于他的文章各处的一些句子仍旧显示出他有令人惊奇的思考能力和远见卓识。虽然他曾经多次被迫卷入战争，或者毋宁说因为这一点，所以他相信所有国家的目标应该是和平。他说，解决争端应该靠外交活动，而不是战争。他督促雅典利用其影响来维护和平，还建议把德尔菲作为各个城邦的集会地点，以讨论彼此间的分歧。他说：“以武力征服别人的人会以为人们会长期屈从于他们的威力，但真正长期的征服靠的

是人们自愿地服从比他们自己强的人。征服一个国家的惟一方式是宽大仁厚。”这个世界还没有达到色诺芬的思想高度。

然而色诺芬最好的书，也就是真正使他声名远播的著作则是关于战争的。我们指的当然是《长征记》，这本书记述的是“万人雇佣军大撤退”的故事。这是一本伟大的书，也是我们借以了解希腊的重要历史文献。没有任何其他著作如此生动地描绘了希腊的个人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希腊人的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希腊之所以取得了如此伟大成就的原因。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这既可以说是希腊人热爱自由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他们热爱自由的结果。希腊人都执著于不受其他人干涉地、按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去向别人寻求指引在他们看来是很不正常的；他们靠自己来判断是非真假。的确如此，除了既令人难以接近，更让人难以理解的神谕之外，在希腊没有任何指引者能得到大家一致的遵从。雅典人没有任何权威的教会、也没有任何权力机构来决定一个人应该信仰什么，他应该怎样去生活。没有任何机构或部门会反对一个希腊人对无论任何东西做任何形式的思考。至于统治机构，希腊人从来没有觉得它应该干涉人的个人生活；比方说，他不应该管一个人是否教他的孩子爱国，也不应该限制一个人应该买多少酒，也不应该强迫一个人存钱防老。所有这样的事情都要靠雅典公民自己决定，并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雅典民主制度的基础是建立在所有民主政体的共同信念上的，那就是相信普通人都能够尽自己的义务并且在尽此义务的过程中能利用他们健全的判断。相信个人是希腊人公认

的信条，而且不管是曾经明言或是未曾明言，这个信条在整个希腊都是很普遍的信条。我们知道斯巴达是个例外，其他地方也一定有一些逆流；然而，最反动的希腊人任何时候都可能回到这种思想上来。据史料所载，远征他乡的斯巴达人曾经哗变，推翻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军官；一个将军下达了他们不赞成的命令，他们也曾经向他投掷石头；在危急关头，他们也曾经废弃了一个不称职的将军，自由采取行动。甚至斯巴达钢铁般的纪律也不能完全根除雅典人对独立的热爱。希罗多德说过：“民治，这个词说起来都那么动听。”在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中，雅典人在萨拉米斯大败波斯人的时候，波斯的女王问：“谁是雅典人的王？”回答是：“他们不是任何人的奴隶或臣属。”因此，所有的希腊人都相信他们征服了波斯暴君的奴隶臣民。自由、独立的人比屈服的、受人控制的人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没有任何军事权威曾经提倡过这种信念，但我们从《长征记》这本书中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这种信念对战士来说也是一样适用的。万人大军经历了最艰难险阻的长途跋涉之后安全地回到了雅典，正是因为他们不是典型的纪律严明的军队，而是一群能发挥个人积极性的人组成的军队。

这部大撤退的史诗是从离巴比伦不远的的一个亚洲小镇中的军营中开始的。一万多名希腊人聚集到了那里。他们来自很多不同的地方：有一位军官来自帖萨利；还有一位来自彼奥提亚；总指挥则是个斯巴达人；他的参谋队伍中有一位雅典平民，名叫色诺芬。他们都是偶然才弃业从军的，这支军队是典型的雇佣军，他们因为在家乡无业可从，这才离乡远

征。希腊当时没有任何战事。斯巴达的统治正处于一段和平时期。那一年是公元前401年，也就是雅典陷落三年之后。

然而其时波斯内乱，纷争多出，一场战争已迫在眉睫。国王的两个儿子彼此不睦，弟欲取长兄之王位而代之。这位弟弟名叫居鲁士，他的名字是从一百五十年之前征服巴比伦的大居鲁士之名而取的。他的名字之所以传闻于世，原因只有一个：他进军波斯的时候，色诺芬曾是他军中一将。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他的名字早就湮没于亚洲众多的王国之间那无穷无尽、对这个世界来说也无任何意义可言的争战之中了。然而他的声名借色诺芬的笔墨得以流传于世。在色诺芬的笔下，他快乐、勇敢、大度；关心自己士兵的福利；和他们患难与共；总是冲锋在前；是个伟大的指挥者。

他麾下聚集的万人大军，除了能吃饱饭和定时领饷这两个目的之外，并不很清楚他们真正要做什么。他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都如愿以偿。他们从地中海出发，穿过沙漠，来到小亚细亚的腹地，他们主要靠从沿途乡村取得给养，这意味着他们经常吃不饱，而且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食物。当时还有另外一支强大的亚洲军队，约有十万左右，不过《长征记》这本书中对它没有详细记载。希腊雇佣军才是居鲁士真正可以信赖的军队。色诺芬说当居鲁士遇到国王的军队的时候，他们已经为他赢得了一天的时间。在庫那克萨一战中希腊人为居鲁士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只是居鲁士本人却死于这场战斗之中，他在与他哥哥厮杀的时候击伤了他哥哥，自己却死在了他的手下。居鲁士死了，这次远征的意义也因此而不存在了。那支亚洲军队自行溃散了。希腊的这支小小

的军队留在了亚洲的中心地带，他们身处异乡，四周都是敌人的军队，他们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武器装备，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返回希腊。不久，他们又失去了指挥者。他们的主要将领在波斯人保证安全的承诺下去和他们进行谈判。他们焦急地等待着，然而将领们却迟迟不归；他们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同一个方向，突然他们看到了一个人，从衣着上看是个希腊人，只有一个人。他们抢上去接他，然而他受了重伤，他说所有其他的人都被波斯人设计谋杀，然后就倒地死去了。

那是可怕的一夜。波斯人的意图很清楚。按他们的经验来说，军中无将，士兵必无所助。将军一死，士兵无非是案上的鱼肉。但他们的计划中惟一的错误就是，他们没有考虑这是希腊的军队。

色诺芬所有的朋友都死了，他信步游荡，离开了混乱的军营，找到一块安静的地方，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看到宙斯的闪电劈落在他的家乡，燃起了一道白光，他醒了过来，坚信宙斯选择了他来拯救这支军队。他顿时热血沸腾，立刻召集那些没有去参加谈判的下级军官来商量对策。他，一个年轻、没有入伍的平民，站起来给那些久经沙场的战士们讲话。他要求他们要抛开绝望的情绪，要“表现出战胜厄运的勇气”。他提醒他们，他们是希腊人，不应该被一群亚洲人吓倒。他的激情感染了其他人，他甚至把他们逗笑了。可是也有一个将领，却不断地重复他们所处的绝境，固执地反对谈论其他的一切，色诺芬建议把他降为普通士兵，让他去扛行李；大家向他投来赞赏的目光，他们对他说，那

个人会是一头很好的驮骡。他们一直推举他来统领后队，然后大家一直要求他对全体士兵发表演讲。他的演讲振奋了人心。当时的情况对其他任何人来说可能都是暗淡的、无望的，但他们是希腊人，他们是自由人，他们出生的国家是自由的国家，他们的祖先也有着自由的传统。而他们要面对的敌人是暴君统治下的奴隶，甚至对自由的概念一无所知。“他们认为我们已经战败了，因为我们的将领们都死了，还有我们的受人爱戴的老将军克利尔库斯。但我们要让他们看到他们把我们都变成了将领。现在他们要面对的不是一个克利尔库斯，而是一万个克利尔库斯。”他赢得了士兵们的信任，这一天早上，他们就开始了返回的旅程。

他们的周围都是敌人，不能相信任何向导，那个年代既没有地图，也没有罗盘。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他们不能沿着来的路回去。因为无论他们路过哪里，沿途的食物都已经被他们吃光了。他们被迫折向北行，沿着河流向上游行进到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发源地，穿过了今天的库尔德斯坦、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高地，当时住在这些地方的人都是一些野蛮部落，这些部落就是他们惟一的给养来源。如果他们不能攻克敌人的要塞并夺取他们储存的粮食，他们就会饿死。最险恶的山地作战在等待着他们，对当地的每一寸土地都非常熟悉的敌人占据着制高点，等待着他们从狭窄的山谷中走过，然后从山顶上滚下许多大石头来砸他们，或是在他们渡过冰冷的急流的时候突然从树丛中向他们放箭，而他们则拚命想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到了更高的山地之后，他们遇到了极为寒冷的天气和极深的积雪，而他们的装备原本

是为了在阿拉伯沙漠的气候准备的。

考虑到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现在的人大概都会认为他们只有严格地遵守纪律，坚持他们优良的军事传统，不爽毫厘地遵从军官的命令，才会有惟一的生存机会。然而他们的总指挥早已经死了；和野蛮人进行山地作战不是他们传统的军事训练项目；更要紧的是，因为他们是希腊人，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他们不愿意盲目地遵守命令。实际来看，他们只有抛弃在他们头脑中已经牢牢扎根的那些规定和限制，他们才能面对当时的危险处境。他们需要的是尽力挖掘每个人身上所有的智慧和创造力。

他们只是一队雇佣军，但他们是希腊的雇佣军，每个人都有很高的智力水平。在某种情况下，这一万名将军的纪律当然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但是，这些希腊人就像我们开发西部的祖先一样，他们知道集体行动的必要性。所有士兵都很清楚，在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处境再加上纪律混乱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纪律完全是出于自觉的，可这居然很奏效。当苦着帆布的四轮车穿过美洲大陆向西挺进的时候，每一个这样挺身而出的人都是因为有着超凡的能力，其他面临危险的人都会随之而行。万人军队的将领们也就是这样得到了他们的职位。军队很敏锐地觉察到一个人的素质的高低，不久之后，年轻的平民色诺芬实际上已经是这支军队的指挥者了。

然而，每个人都负有一定的责任。有一次色诺芬派一个侦察队去寻找一条过山的路，他对他们说：“你们每个人都是指挥者。”不论他们碰到任何危险，他们就马上召开一次会

议，向大家说明当时的情况，请大家展开讨论。“无论谁有任何更好的想法，请说出来。我们的目的是要保证所有人的安全，这也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他们经过反复讨论之后，大家进行表决，然后按大多数人的意见行动。不称职的指挥官受到公开审查。军中所有的人都是法官，他们决定是惩罚受审者，还是将其无罪开释。这看起来像是一幅漫画，可是对受到审判的普通人来说，从古到今从没有比这样的判决更公正的了。根据色诺芬的记载，由这一万名将军临时变成的一万名法官从来没有通过一条不公正的判决。有一次色诺芬因为鞭打一名士兵需要对大家作出解释，他说：“我承认我确实打了他，我告诉他把一名受伤的士兵背回军营来，可我发现他居然将他活埋了。我还鞭打了其他的人，因为我发现他们蜷缩在雪堆里等死，还有那些落在后面的筋疲力尽的可能被敌人追上的士兵。打他们一下，他们就可能爬起来快点儿走。我得罪过的那些人现在来责难我了。可我在战斗中、在行军途中、在寒冷中、在疾病中帮助过的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他们不记得了。可是记住一个人的好处比记住他的恶行却要好得多，而且也要愉快得多。听完了色诺芬的解释，参加会议的人记起了色诺芬过去的行为，他们站起来走开了，色诺芬没有获罪。”

色诺芬的这篇辩护词完全消除了所有人的不满情绪，这充分说明了他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从他的话语中可以看到他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但他没有生气，没有憎恨，最重要的是，他没有自以为是。他的那些听众信服了他直率、诚实的话；他毫无自我吹嘘的发言使他们想起了他为大家作出的巨

大贡献；他们也理解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毫无瑕疵的，他只是要他们记得他的过失，也记得他的好处。他理解他的听众，也知道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品质，至少是怎样领导希腊人。在他写的一本关于大居鲁士的书中，他描绘了一名理想的将军的形象，显然，要一个东方的君主符合这样的形象是非常荒唐的，但它却完美地体现了希腊人如何设想使那些最独立、最自主的人愿意追随另外一个人的办法。他说：“一个领导者自己必须相信自愿的服从一定胜过强迫的服从，而且他只有真正清楚应该做什么，才能获得别人自愿的服从。这样他才能获得别人的服从，因为他使他们相信他知道最好的方法，就像一个医生使他的病人服从自己一样。而且他忍受的艰险、疲劳、严寒酷暑要比他要求他的士兵应该做到的还要多。居鲁士说：‘不能身先士卒的人不会成为一个好的指挥官。’”不管事实是否确实如此，没有多少经验的平民色诺芬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办法来赢得万人大军的信任。他能使他们相信他知道最好的方法，他们也愿意放弃自己的想法，欣然地追随着他。

他的行为也向士兵们表明，即使他们推选他为指挥者，他和其他士兵之间也是平等的。有一次他骑马从他负责的后队去和前队联系，当时雪下得很大，军队行进非常困难，有一个士兵冲他喊道：“啊，你骑在马上可真是舒服。”色诺芬从马上跳下来，把那名士兵推到了一边，站到了他的位置，开始和其他士兵一起行军。

不管遇到了多么危急的情况，那些只有自由人才能够想的出来的创见总是帮他们渡过难关。他们一致同意扔掉了他

们的行李和所有的战利品，他们说：“我们会让敌人帮我们搬运我们的行李。我们打败了他们之后，我们就可以随意取用我们需要的东西。”刚开始行进的时候，他们曾经多次遭到波斯骑兵的重袭，因为他们没有骑兵。他们军中的罗德斯人用投石机投石头能比波斯人远一倍，他们把投石机架在驮骡的背上，只射敌人的骑手，然后再把毫发无损的马匹牵回来，从此，波斯人就不断地给他们提供马匹。如果他们需要箭的话，他们就派一些比敌人射得远的弓箭手去佯攻，然后把敌人雨点般射落在地上的那些箭很容易地拣回来。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波斯人为他们所用。到了山上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了他们训练过的那些战术。他们不再排成紧密的队伍，即使这是他们训练过的惟一的编队形式，然后开始排成长队行进，有的时候队与队之间相距很远。在崎岖的山地行军的时候，这本来只是一种常识，但是反映了希腊军人自觉的品质。这是纪律严明的军事思想从来都不注重的东西。

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很寒冷，有的时候几乎要冻僵，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很饥饿，有的时候几乎就要饿死，而且他们总是没完没了地在战斗，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保全了自己。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们到底经过了哪些地方。有一天，色诺芬走在队尾，他策马走上了一段很陡峭的山坡，他听到前面传来嘈杂的呼喊声，士兵们都大喊大叫起来。遇到埋伏了，他想，于是他命令士兵全速跟上，他也迅速催马上前。山顶上没有敌人；只有希腊人。他们都站在那里，眼睛都望着同一个方向，脸上流满了泪水，他们的双手都指向前方。士兵的喊叫声最后化成了一个声音：

“海！海！”

他们终于回到了家。对希腊人来说，海就是家。这是一月中旬。他们离开丘纳克萨的时候是九月七日。在四个月的时间内，他们走过了大约两千英里的路程，他们在这段路程所经历的艰难险阻不仅此前闻所未闻，此后也绝无仅有。

《长征记》是希腊人的故事集，是希腊人的缩影。一万名天生独立的人，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向世人证明了他们能够完美和谐地协调作战，证明了自愿的合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奇迹。希腊政权，或者至少可以说，我们最熟悉的雅典政权也证明了同样的奇迹。指引希腊人从遥远的东方安全地回到希腊的力量，也就是使雅典伟大杰出的力量。雅典人就是他们自己的法律，但是他们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和他们为国家竭尽全力的愿望相辅相成。这就是他们对生活实际的自然反应，没有任何东西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雅典城邦就是他们的保护者，他们的安全感，也是他们的骄傲，是他们作为希腊人的一切价值的保证。

柏拉图说，一个人只有在为城邦服务的过程中才能使他们的道德真正完善起来。雅典人因为不把他们自己的生命当做个人的事情而获得了拯救。我们的“idiot（白痴）”这个词源于希腊人对公共事务不负任何责任的人的称呼。修昔底德记下了伯里克利曾在葬礼上讲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是自由民主的政体，但我们也是顺从的。我们遵守法律，尤其是那些保护受压迫者的法律，还有那些不成文的法律，谁违反这些法律，就会得到众人一致的谴责和羞辱。我们不允许一个人汲汲于个人的事务而不

理会公众的事务。我们和其他的城邦不同，因为我们认为一个远离公众生活的人是无用的人，然而我们的精神是独立的、完全自主的，我们不屈服于任何人。

但这种绝妙的平衡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毋庸置疑，这种平衡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候也并不是完美的，正像人类任何崇高的思想在它的形成过程中都不是完美的一样。即便如此，这仍旧是希腊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基础。民主，所有人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自由，每个人都自愿成为城邦的仆人的信条是所有希腊的天才们的思想基石。这个信条在伯里克利的时代被人们追求金钱和权力的热潮大大地挫伤；伯罗奔尼撒之战将它完全断送了。然而，自由的个人自发地团结在一起，为公众生活贡献力量，这个理想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世界宝贵的财富，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第十一章 悲剧的概念

有史以来，世上称得上悲剧大师的人共有四位，其中三位都是希腊人。希腊非凡的特点正是在悲剧中才最清楚地表现出来。除莎士比亚之外，三位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都可谓举世无俦。悲剧是希腊人独有的成就。他们首先真正理解了悲剧并把它发展到了顶峰。悲剧不仅仅直接触动了那些伟大的悲剧作家，也引起了所有希腊人的关心，他们深深地为悲剧所吸引，其中一次演出就有三万多名观众来观看。希腊的天才们对悲剧有最深刻的洞察，并表现出他们最深刻的内在品质。

希腊人性格中最鲜明的特点，在于他们不仅能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而且还能看到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惟其能够如此，他们的艺术创造才与众不同，他们的艺术最显著的特点是它较少挣扎苦斗，而富有其独特的平静和安宁。悲剧似乎能够使我们相信确实有那么一个真就是美，美就是真的领域。希腊艺术家带领我们走向这个领域，用他们的艺术照亮生活中的黑暗混乱，虽然悲剧带来的光明和宗教信念耀眼的光明比起来要显得闪烁不定，但是它却有它独特的魔力，使人感到安慰，虽然它给人们带来的希望并不确定，然而它却仍非常重要。对所有的伟大诗人来说都是如此，但对悲剧诗人来

说最是如此，因为他们要用诗歌的力量去描述那些无法解释的东西。

悲剧是希腊人首创的，因为在希腊，思想是自由的。人们对人生的问题思考得越来越深入，而且开始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生活中充满了邪恶，所有事情都是不公正的。于是有一天，有这样一个诗人，他认识到了这个世界存在无可救药的邪恶，但他仍旧能用他诗人的力量去发现生活中真实的美，第一部悲剧就诞生了。有一本非常出色的书讨论了这个问题，书的作者这样说：“探索的精神遇到了诗歌的精神，悲剧就诞生了。”具体来说：希腊早期的像神一样的英雄和头头是道的诸神在遥远的、狂风肆虐的、地势起伏不平的特洛伊展开了激战；而在希腊较平静的地方，每一件普通的事都闪耀着美——这就形成了如诗歌创作中的双重世界。然后新的时代开始了，人们开始不满足于歌声和故事的美，他们要努力去了解、去解释。悲剧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无比伟大的诗人，他不满足与原有的神圣的传统，而且他有足够伟大的心灵能包容新的和难以让人容忍的真实——这就是埃斯库罗斯，世上第一个悲剧作家。

悲剧是属于诗人的。只有他们才能“到达太阳的高度，在生活的不谐之音中奏响一个和弦”。只有诗人才能写出悲剧。因为悲剧正是痛苦借着诗歌的力量升华成快乐，如果诗歌是真正的知识，而且那些伟大的诗人的指引是可以追随的，这种升华就有最引人注意的含义。

痛苦化为了快乐，或者我们可以说，痛苦中蕴藏着快乐。悲剧看起来是一种奇怪的东西。确实没有比它再奇怪的东西

了。悲剧向我们展现了痛苦，却由此给我们带来快乐。它展现的痛苦越大，情节越可怕，我们感到的快乐就越强烈。悲剧作家们选择的都是生活中能产生的最离奇、最可怕的事件，通过他们给我们展现的景象，我们得到了一种激情的享受。这里就有了某种值得思考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借口说罗马人看角斗士厮杀也算是过了一个假日，或者说到现在凶残、野蛮的本性仍旧困扰着大部分的文明世界，就将这种东西随随便便地抛到脑后去。即便我们能够如此，我们也仍旧不能解释人们从悲剧中得到快感这个神秘的问题。它和残酷与血腥的欲望毫无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悲剧”和“悲剧的”这两个词，这将颇有启示。痛苦、悲伤、灾难，我们认为这些词都是使人感到压抑、使人情绪低沉的——我们常说痛苦的深渊、悲伤得肝肠寸断、灭顶之灾。但谈到悲剧的时候这些比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说它们把我们推上了悲剧的高度，而不再说别的什么了。我们说某种情绪给我们带来深深的忧伤，但我们不说悲剧给我们带来深深的忧伤。我们总是说悲剧的高度。词语不是无足轻重的小问题。真实的话语曾被人们叫做诗歌的化石，就是说，每句这样的话语都是创造性思维的标志。人类本性的哲学都清晰地表现在人类的语言之中。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人本能地感觉到悲剧的痛苦和所有其他的痛苦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不是程度上的不同，而是类别上的不同。悲剧中有某种东西使它与其他的灾难之间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之

中。

悲剧是通过痛苦给人们带来快乐，所有注意到这个奇怪的矛盾的人都看到了这种区别，世上很多鸿儒大哲也都曾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告诉我们，悲剧的快感自成一类。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怜悯和畏惧，和一种被清洁净化了的情感。”黑格尔认为悲剧是一种“调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生活中产生的不谐和融入了永恒的谐和之中。叔本华说：“心灵的激情会说：事情非如此不可，而悲剧就是对这种激情的接纳。”尼采说：“重新肯定直面死亡去生活的意志，而在这重新肯定之际为意志的不可穷尽而欣喜。”

怜悯、畏惧、调和、快乐——这些都是悲剧快感的组成部分。不能激起这些情感的戏剧不能成其为悲剧。所以哲学家们说的和人类通常的判断是一致的，悲剧是高于、超越了痛苦的不谐之处的东西。但是一部悲剧为什么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情感，悲剧的最本质的成分是什么，这些问题只有黑格尔一个人做过探索。他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说，悲剧唯一的主题是精神的斗争，而且斗争中的两种精神都引起我们的同情。但是，正如黑格尔的评论者们所说的，按他的说法，他就把无辜受难者的悲剧排除在外了，而且他的这种说法也没有把考狄莉娅和迪伊阿尼拉之死包括进来，因此我们还不能把他的说法作为悲剧的最终定义。

的确，对每一个无辜的人所经受的苦难都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我们甚至可以把他们归入完全不同的类别中去。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是最伟大的悲剧之一，剧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位无辜的受难者，但是除了这个纯粹形式

上的联系之外，剧中的那个充满激情的、蔑视天神和宇宙间一切力量的反叛者和那个既可爱又充满爱心的考狄莉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们给悲剧下一个最终定义的话，这个定义应该包括生活和语言能包容的所有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人物性格产生的各种情况。它必须要包括像《安提戈涅》这样宁可睁着眼睛死去，也不能容忍她的兄弟死而不能下葬的性格倔强的少女，也得包括像麦克白这样弑君杀臣的野心勃勃的狂人。这两部悲剧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却在我们心中激起了同样的反应。它们都给我们带来了最强烈的悲剧快感。它们之间有某种共同的东西，但是哲学家们没有告诉我们那是什么。他们关心的问题是悲剧使我们产生了怎样的感受，而不是悲剧实质上是什么。

整个文学史上只有两个时代是产生伟大悲剧的时代，一个是伯里克利的雅典，另一个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这两个时代之间前后相距两千多年，它们之间却有很多相同之处，它们也用相同的方式表达自己，这些相同之处可能会给我们了解悲剧的本质有些帮助，因为这两个时代都远远不是黑暗没落的，而都是精神昂扬地看待生活，充满了产生令人震颤的不可估量的发展可能。那些在马拉松和萨拉米斯战胜敌人的人们，那些打败了西班牙、眼看着无敌舰队沉没的人们，他们都高高地昂头挺立。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神奇；人类是美好的；生命就像是活在浪尖上。最重要的是，英雄主义的那种强烈的快乐激动着人们的心房。有人可能会说，这里没有产生悲剧的土壤啊。但是生活在浪尖上的人们要么感觉到悲哀，要么感觉到欢乐；他们感觉到的不可能是平淡

沉闷。和能在生活中看到悲剧的那种心性相对的不是看到欢乐的那种心性。和认为生活是一场悲剧看法相对的是认为生活是肮脏的看法。当人们看到人性之中缺乏尊严和意义，人性是琐碎的、卑贱的、而且陷入了凄凉无助的境地的时候，悲剧的精神就已经不存在了。“有时候，请允许美妙的悲剧披着帝王的华服浩浩荡荡地走过。”与悲剧完全相反的则是写作《底层》的高尔基。

其他的诗人只是可能会去追寻生命的意义，而悲剧家必须要这么做。可是很奇怪，有一种谬论非常普遍，那就是悲剧意图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要依靠外界环境，要靠：

面具，和古代华丽的衣饰

奢华的场面、盛宴和尽情的喧闹——

这些东西和悲剧风马牛不相及。生活的表层是喜剧关心的范围；悲剧对此不予一顾。我们肯定不会到“集市街”和“天顶”去寻找悲剧，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地方过于平俗。没有任何内在必然的原因说不能在巴比特在“天顶”的家中上演悲剧，在那里上演悲剧和在艾尔西诺城堡一样适当。惟一不能的原因在于巴比特自己。叔本华从悲剧中发现的那种“奇妙的将人向上提升的力量”从来不从外界的事物中寻求任何推动力。

人类生命的尊严和意义——这些，也只有这些，是悲剧绝不会弃而不顾的。没有这些也就没有悲剧。构成悲剧的因素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要回答上面的分析中提出的问题，那就是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人性的尊严靠的是什么。对于这两个问题，悲剧作家们给了我们坚定的回答。伟

大的悲剧本身就给它自己提出的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首先，正是因为我们能够忍受苦难，我们才比麻雀要更有价值。如果麻雀有更大的或是和我们一样大的忍受苦难的潜力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确定不疑地说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万物之灵了。当我们深究我们为什么坚信每个人的超群的价值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忍受极大的苦难。不管它是“天顶”还是艾尔西诺城堡，事物外部的细节有什么用呢？悲剧关注的中心是忍受苦难。

但是，应该注意，悲剧关注的不是所有的痛苦。我们的痛苦有不同的程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同样地忍受痛苦。我们的感受力之间的差别比我们任何其他的方面的差别都大。有人的忍受能力差一些，有人忍受能力强一些，人的尊严和意义就是根据每个人能忍受苦难的程度来确定的。没有任何尊严能比得上正在忍受痛苦的灵魂的尊严。

我和悲哀并排坐在一起；

这就是我的王位，叫王侯们过来向它行礼。

悲剧被推上了王位，惟一可以进入悲剧的王国的人必须是真正的贵族，那些感情丰富的人。悲剧的要素之一就是感受力强的灵魂。有了这样的灵魂，任何灾难都可能变成一部悲剧。但是即使大地被移动，山峰填平了海洋，只要有些许卑贱和肤浅掺杂进来，悲剧也就不成其为悲剧了。

罗马历史中有着黑暗的一页，其中记载着一个七岁的小姑娘，她的父亲犯了死罪，她受到株连，也必须去陪死，她走过的时候，围观的人们一边哭，一边问：“她做了什么错事？如果他们告诉她们的话，她绝对不会再做第二次了。”——

然后她就被送进监狱，随即上了刑场。这个故事令人心碎，可它不是悲剧，这只是一个凄惨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没有让我们的灵魂去攀登的高峰，只有无尽的黑暗，有令我们伤心落泪的故事。无辜的人遭受苦难本身不是悲剧。死亡本身也不是悲剧，甚至那些年轻的、那些美丽的、那些可爱的和那些被爱的人，他们的死亡也不是悲剧。像麦克白感觉和遭受死亡那样感觉和遭受的才是悲剧。像李尔王感受考狄莉娅的死亡那样感受到的死亡才是悲剧。莪非丽亚的死不是悲剧。她只是她自己；只有当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的悲伤是悲剧性的悲伤的时候，它才是悲剧。《安提戈涅》是一部悲剧，并不是因为上帝的律法和凡人的律法的要求之间产生的冲突。使这部戏成为悲剧的正是安提戈涅本人，她那么伟大，遭受了那么大的折磨。哈姆雷特为杀死他的叔叔而犹豫不决，这不是悲剧。真正的悲剧在于他的感受力。把这部戏中所有的情节都改换成其他的情节，哈姆雷特无论陷于任何灾难中都可能是一个悲剧；而不管剧中的灾难有多么深重，波洛涅斯绝不会是一个悲剧人物。能忍受巨大的苦难的灵魂在忍受苦难——这个，只有这个，才成其为悲剧。

如此看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区别和悲剧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人们一直相信正好相反的说法。有人认为，希腊人到神话中去寻找悲剧的主题，是因为他们要尽力离现实生活远一点，而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实生活中没有产生伟大悲剧的空间。最近有一位悲剧作家说：“现实主义是悲剧的毁灭者。”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现实主义真的只能写寻常的事物，悲剧就会被排除在外，因为能产生伟大的情感的灵魂是

不寻常的。但是如果任何人类的事物都不外乎现实主义的关注范围，那么悲剧也就包括在它的关注范围之内，因为不寻常的事物是和寻常的事物一样真实的。当莫斯科的艺术家演出《卡拉玛佐夫兄弟》的时候，舞台上有一个非常可笑的矮个子男人，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挥舞着胳膊，一边在台上走来走去，一边低声啜泣，这个形象与传统的悲剧人物形象简直有天壤之别，但他却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他撕下了传统悲剧美丽的外衣，但他却是真正的王者，他发出了痛苦的声音，这是在斗争中产生的人的心灵难以忍受的痛苦的声音。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这一幕更沉闷、更典型的现实主义场景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感觉到怜悯和畏惧，直到这个人向人们展示了他所能忍受的苦难而获得了尊严。易卜生的戏剧不是悲剧。无论他是不是现实主义者——一个时代的现实主义者很可能到了下一个时代就成了浪漫主义者——他剧中的人物都是一些灵魂渺小的人物，他的戏剧也只是结局较为悲惨罢了。我们看完他的《群鬼》，心中感觉到的是对社会的恐惧地发抖和冷冷的气愤而已，实际生活中有时的确会如此，但这些情感都不是悲剧情感。

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都出自于法国人或俄国人之手。读完一本法国小说，我们感觉到的是对人类的一种绝望和厌恶，我们感到人类是那么的卑劣、琐碎和可怜。但是读俄国小说的时候我们却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我们也在俄国人的小说中一样可以看到法国小说常有的那种描写人本性中的卑劣、野蛮，生活的不幸，但是我们读完之后感觉到的不是绝望和厌恶，而是怜悯和好奇，人竟然能忍受如此深重的苦

难。俄国人是这样看待生活的，因为俄国的天才们都是非常诗人化的作家；而法国的天才们不是。《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悲剧；《包法利夫人》却不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或是不同程度的现实主义与此都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渺小的心灵与伟大的心灵的问题，是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的作家和诗人的天赋之间的问题。

如果希腊人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的悲剧作品，我们就很可能难以知道他们达到了怎样的高度。这三位诗人能够测知人类深深的痛苦，而且他们能够用悲剧来认识和呈现这种痛苦。他们说，邪恶的神秘遮蔽了“任何脑子不是石头块的人都会看到的东西”。痛苦可以激化成一种强烈的感情，而且在悲剧中，人们在平时无法把握到的意义会在瞬间向人们展示出来。特洛伊女王在最危难的时候，欧里庇得斯通过她对我们说：“假如上帝不曾玩弄我们的命运于股掌之间，并将我们降为凡俗，那么我们死去的时候不会给后人留下任何东西。后人在我们身上将找不到可以歌颂的主题，也不会将我们的悲哀写成伟大的诗篇”。

为什么普通人的死是一件凄惨的、令人震颤的事情，会促使我们转身走开，而为什么英雄的死却总是悲剧性的，会让我们感觉到一种鲜活的生命带来的温暖的感觉？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解开了悲剧为什么会给人带来快感这个谜。司各特爵士说：“永远不要对我说勇敢者的鲜血白流了，他们向未来所有的人提出了庄严的挑战。”一部悲剧结束的时候也向我们提出了同样的挑战。伟大的心灵在忍受煎熬和遭受死亡的时候将痛苦和死亡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

界。通过它我们可以瞥见斯多噶派的哲人皇帝所称的上帝我父之城，比起我们活着的人面对的现实来说，那是一个更深远、更终极的现实。

第十二章 埃斯库罗斯

第一位戏剧家

当尼采为“悲剧性的”这个词下那个著名的定义的时候，他和在类似情况下的大多数哲学家一样，眼睛盯着的不是缪司女神本身，而是某个个别的悲剧家。“重新肯定直面死亡去生活的意志，而在这重新肯定之际为意志的不可穷尽而欣喜。”他说这话指的不是索福克勒斯，也不是欧里庇得斯，而是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的本质。悲剧在展现苦难和死亡的时候有着神奇的力量，它不是让我们感到压抑，而是让我们情绪激昂，这一点我们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比在任何其他悲剧诗人的戏剧中都看得更清楚。他是第一个悲剧作家；悲剧是他首创的，他的精神特质也在悲剧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种精神是战士的精神。埃斯库罗斯是一个马拉松勇士，这个称号只授予击退早期的为数众多的波斯侵略者的那一小队官兵中的各位勇士。他的墓志铭说明他对荣誉是如此珍视，他的诗歌似乎也不能并列左右：

雅典人埃斯库罗斯，欧福里翁的儿子，躺在这里，
周围浪漾着杰拉的麦浪。马拉松圣地称道他作战英勇无

比，长头发的波斯人听了，心里最明白。^①

他是否也曾参加别的战斗？除了他的作品中提供的一些线索之外，我们对这个问题和其他所有关于他的问题都没有确切的答案。他的墓志铭说明他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此外还记录了一些关于他的某些日期——哪部戏是哪年写的，还有他的死去的日期——这就是我们能知道的关于他的所有的东西了。没有像柏拉图那样的人用肯定、熟稔的笔触记下他的一言一行，从而使他成为一个永远活生生的人。他像莎士比亚一样，只允许我们从他的作品中来了解他，这使我们对他的生平所知很不确切，因为伟大的诗人关心的范围是整个生活，他们能把自己变成这个世界中的任何人物，就像济慈曾经说过的那样，他们可以把自己想像成埃古，也同样可以把自己想像成伊摩琴。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从埃斯库罗斯的所有现存作品——他所有九十部作品中的七部——中可以看到他的性格和他的心性的主体，而莎士比亚的戏剧范围太过宽广，无法作此归纳。可是我们却不能轻易地下这个结论，因为如果埃斯库罗斯所有的九十部戏剧都留存了下来，而莎士比亚只留下了七部悲剧，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但是我们强烈地觉得埃斯库罗斯的每一部悲剧都表现出作者的崇高的心灵和思想，以及他本人充分体现出来的那种英雄榜样，因此不太可能设想埃斯库罗斯写出的任何东西不具有这种崇高与英雄的特色。

关于埃斯库罗斯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得出

① 译文引自《悲剧两种》，罗念生译。

以上这些论断。可是对他的实际经历我们却所知甚少。我们推测他习惯于大家庭的生活方式，他看不起暴发的新贵——他在《普罗米修斯》中，借宙斯嘲弄这种人是“暴发之神，逞一时之势，发片刻之威”。克吕泰涅斯特拉对俘虏来的特洛伊公主说，如果一个人不幸沦为奴隶的话：

那么落在一个继承祖业的的主人手里，
是一件值得感谢的事。有些人一本突然收万利，
可是他们对奴隶在各方面都很残忍，而且很严厉……^①

因为他曾经参军打仗，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有些段落显然是根据个人的经验写出来的：“我们宿营的地方离敌人的城墙很近；我们衣服因为潮湿已经开始腐烂；头发里面生满了虱子。”这不是一个人伍不久的新兵眼中的战争。更值得注意的是克吕泰涅斯特拉在特洛伊陷落之后发布的通告中长篇大论地叙述他们取得胜利的经过的时候，突然插入了一段对一个新近攻陷的城池的白描：

有的人倒在丈夫或者弟兄的尸体上，老年人倒在儿孙的尸体上，用失去了自由的喉咙悲叹他们最亲爱的人的死亡；有的人，由于战后通宵掳掠而劳累，很是饥饿，停下来吃城里供应的早餐，不是按次序发配分配的，而是各自碰运气摇得了签，就住在特洛伊被攻占的家里，不再忍受露天的霜和露，也不须放哨，就可以像那些有福的人那样睡一夜。^②

① 译文引自《阿伽门农》，罗念生译。

② 译文引自《阿伽门农》第一场，罗念生译。

这些话出自一个伟大的女王之口，就显得有些奇怪，这倒像是一个老兵在回忆他过去经常见到的某些场面的细节。但是只有这些段落才为我们了解他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些线索。

我们自己，我们之中最伟大的人，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埃斯库罗斯生活的那个时代凭着它的希望和努力，沿着人类命定的道路无所畏惧、毫不迟疑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之成为了人类黑暗的历史上闪亮的一页。这个时代为数很少的人竟然击败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力量，波斯人遭到了如此惨痛的失败，他们再也不可能发动另一次这种只给人们带来灾难的侵略行动了。这次伟大的冒险获得成功影响到整个希腊。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紧张热烈了。危险、恐惧和苦闷激励了人们的精神，也提高了人们的洞察力。开始的时候他们好像注定要遭受失败，注定要失去所有的财产，然而事情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他们却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不但使他们大喜过望，也大大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人们相信他们可以创造出英雄业绩，因为他们看到有人创造出了英雄业绩。这就是悲剧诞生的时刻，因为悲剧是痛苦和欢乐的神秘的混合体，它展现了人们在面临不可避免的灾难的时刻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可战胜的精神。直到这个时候，希腊的诗人们一直以一种直接的、无自我意识的眼光观察这个世界，而且他们发现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勇敢行动的光荣和自然界万物的美好就使他们感到满足了。埃斯库罗斯是新一代的诗人。他在表现外在世界之美的诗歌和表现人类痛苦之美的诗歌之间的鸿沟之上架起了一座桥梁。

他是第一个把握住生活中令人迷惑的“世界内心深处的矛盾”的诗人，他对生活的了解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了解到；他意识到了遭受苦难的神秘之处。他看到人类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紧紧地和苦难捆在了一起，致力于一种奇怪的冒险，终生与灾难为伍。但对英雄们来说，最深重的苦难对他们正是一个挑战。埃斯库罗斯那个时代的精神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天生的斗士，对他来说，能和强大的对手势均力敌就足够了，他不必一定成功。生活对他来说就是一场冒险，其中确实充满了危险，但人生来就不是为了享受天堂般的安宁。生活的充实正在于生活中充满了艰难险阻。即使人生再不济，在我们身上至少还有某种东西，可能反败为胜。

一个有着这种英雄性格的人，他洞察人类的苦难的黑暗现实的能力，和他超凡的诗才撞击出了新的火花，悲剧由此而诞生了。如果悲剧就是要展现人类最深重的苦难和人类最崇高的业绩，那么埃斯库罗斯就不仅仅是悲剧的创始人，而且还是所有悲剧家中最具有悲剧性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生活嘈杂的噪音中能够奏响这样动听的乐曲。在他的剧中没有任何的退却，没有任何被动接受。伟大的精神以伟大的方式来承受苦难。《普罗米修斯》中的歌队的少女们要求知道她们面前所有的罪恶：“这样，当一个人躺在病床上，静静地面对所有的痛苦，也是美好的享受。”安提戈涅要做的事情对她自己来说也意味着死亡，这时候，她呼喊道：“勇气！我将有力量，我也将知道如何行动。”克吕泰涅斯特拉给了她丈夫最后一剑，他倒地死去。这时候，她打开了宫门向大家宣告她

做了什么：

我还是站在我杀人的地方，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是这样做的——我不否认——我刺了他两剑；他哼了两声，手脚就软了。我趁他倒下的时候，又找补第三剑，作为献给他地下的宙斯，死者的保护神的还愿礼物。这么着，他就躺在那里，断了气；他喷出一股汹涌的血，一阵血雨的黑点便落到我的身上，我的畅快不亚于承受天降的甘雨，正当出穗的季节。^①

普罗米修斯，在毫无帮助的情况下，面对着那不可抗拒的力量，但他却没有屈服。即使只说一句表示屈服的话他就可以获得自由，他也毫不退让；在最强大的力量面前，没有任何卑微的忏悔。诸神派使者来劝他服从宙斯的命令，他回答说：

宙斯无法用苦刑或诡计强迫我道破这秘密，

除非他解了这侮辱我的镣铐。

让他扔出燃烧的电火吧，

让他用白羽似的雪片和地下响出的雷霆使宇宙紊乱吧；

可是这一切都不能强迫我告诉他，

谁来推翻他的王权。

赫耳墨斯

傻子，面对着眼前的苦难，你尽可能，尽可能放明白一点吧。

^① 译文引自《阿伽门农》，罗念生译。

普罗米修斯

你白同我纠缠，好像劝说那无情的波浪一样。^①

他说完了最后一句话，宇宙就在他的身上崩裂。他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看着我，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帕斯卡说，他比将他碎为齏粉的宇宙还要伟大。埃斯库罗斯就是以这种方式看待人类，坦然地面对灾难，永不屈服。“鼓起勇气。痛苦，当它到达了巅峰的时候，就不会再持续很长的时间了。”——这是他一部佚失的剧本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简洁恰当地表达了他的精神，也恰当地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

他是一位拓荒者，完全凭着自己无穷的力量来开辟自己的道路，而且从来不在某个地方截止或停滞不前。他的作品从来没有让人觉得达到了完美的境地，从来没有让人觉得他到达了顶峰，再往前走就是下坡路了。若是个石匠，他可能是雕凿迈锡尼大门巨石的匠师；不会是雕刻普拉克西特里斯那赫耳墨斯的雕像的匠师。阿里斯托芬是埃斯库罗斯最尖锐的批评者，但他也是最喜欢埃斯库罗斯的人，即使在嘲笑他的时候也不例外。形容词是诗人的试金石，而他认为埃斯库罗斯使用的形容词“清新，好像被激流冲刷的树木，又被战争中的巨人吹散”，阿里斯托芬的用语让人想起“激烈战斗”的狂风暴雨，那种落在李尔王头上的“熊熊燃烧的思想的火焰，先驱一样劈开橡树的闪电”。一种杰出的信手拈来的灵感伴随着超人的力量。埃斯库罗斯从来不用费推敲之功，这一

① 译文引自《普罗米修斯》，罗念生译。

点他和莎士比亚是一样的。他们的灵感如喷涌的泉水，从不会像一般人那样在苦闷的夜晚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为求一字之立而绞尽脑汁。

他们两人之间有一种非常相似的东西。莎士比亚也曾在营营众生的层面之上看到人们取得成功、遭受痛苦，他也曾经为有像马拉松和萨拉米斯战役中那样的勇士的时代的高远的希望和勇气所感动。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奇迹、生命之中的美、恐惧和痛苦，以及人们去行动、去倾听的能力有最丰富的感觉，任何其他作家都无法和他们相比。

你的朋友们是狂喜，是剧痛，
是爱，也是不可征服的人类思想。

这是一位十九世纪的诗人写下的两句诗，这两句诗正好道出了莎士比亚和埃斯库罗斯的特点，这也正是他们两个人的作品的特点。

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在构想上和埃斯库罗斯的风格非常相似，甚至比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戏剧还要更像埃斯库罗斯。麦克白的城堡和阿伽门农的宫殿的气氛是完全一样的。在这两个地方永远都是黑夜；空气中弥漫着阴郁的气息；死亡从大门漂浮进来。这两部剧作中描写的都不仅仅是黑暗肮脏的勾当。俄狄浦斯的宫殿中一样浸满了鲜血；那里充满了恐惧，命运缓慢的脚步声清晰可闻，无情地迈向生命的终点。但在《奥瑞斯忒斯》和《麦克白》中，这种恐惧中包含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命运的脚步声并不清晰可闻；这种声音被捂住了；我们的耳朵在倾听可是却听不真切；那慢慢逼近的东西被包裹在黑暗之中；那是某种我们未知东西，

还有罪恶的神秘。

我们无法通过摘录原文来说明这两部悲剧在总体感觉上的相似之处，但它们都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一种即将来临的无法解释清楚的恐惧，有很多段落可以说明这一点。在这两部悲剧中，凶兆的警钟一次又一次地敲响。某种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到底是什么事情，没有人说得出来，一切都可能在我们的眼前发生。

《麦克白》

第一幕，第三场

麦克白

为什么那句话会在我脑中引起可怖的印象，
使我毛发悚然，使我的心完全失去常态，
卜卜地跳个不停呢？
想像中的恐怖远过于实际上的恐怖……。

第一幕，第四场

麦克白

星星啊，收起你们的火焰！
不要让光亮照见我的黑暗幽深的欲望。
眼睛啊，别望这双手吧；
可是我仍要下手，
不管干下的事会吓得眼睛不敢看。

第一幕，第五场

麦克白夫人

阴沉的黑夜，
用最昏暗的地狱中的浓烟罩住你自己，

让我锐利的刀瞧不见它切开的伤口，
让青天不能从黑暗的重衾里探出头来，
高喊“住手，住手！”

第三幕，第四场

麦克白

去！离开我的眼睛，让土地把你藏匿了！
你的骨髓已经枯竭，你的血液已经凝冷；
你那向人瞪着的眼睛也已经失去了光彩。^①

《阿伽门农》

我怕听黑暗中隐藏的消息，
因为神并不是不注意那些杀人如麻的人；
一个人多行不义，虽然侥幸成功，
但是那穿黑袍的厄里倪厄斯终于会使他命运逆转，

.....

这恐惧为什么在我这预知祸福的心上不住地飘来飘去？

.....

但是我的心自己学会了
唱报仇神的不须弦琴伴奏的哀歌，

.....

我的内心不是在乱说——
这颗心啊，它正在那旋转到底的旋涡里面

① 译文引自《麦克白》，朱生豪译。

绕着那预知有报应的思想转来转去。
但愿这个猜想不正确，
不会成为事实！

卡珊德拉

你把我带到什么地方了？带到什么人家里了？

歌队

带到阿特瑞代家里了。

卡珊德拉

这是个不敬神的家，
它能证实里面有许多亲属间的杀戮
和砍头的凶事——
一个杀人的场所，地上洒满了血。
啊，这是什么阴谋，
什么新的祸患？
这家里有人在计划一件莫大的祸事，
那是亲友们所不能容忍而无法挽救的；
援助的人却远在天涯。

卡珊德拉

你们看见那些坐在屋前的，
像梦中的形象一样的小东西没有？
那些孩子好像是被他们的亲人杀死的，
他们手里全是肉——用他们自身的肉做的荤菜；
现在看清楚了，
他们捧着他们的心肺，还有肠子——

惨不忍睹的一大堆，
都被他们的父亲吃了。
为了这件事，我告诉你们，
有一头胆小的狮子呆在家里，
在床上翻来覆去——计划报仇。^①

从两个剧本之中摘录下来的这些段落产生的相似的效果，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的，同样的例子还可以找出许多。莎士比亚的戏中有三个女巫，埃斯库罗斯的戏中有复仇三女神，这种相似不是偶然的相似。两种角色都绝不会出现在俄狄浦斯的王宫中。

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之间另外一个明显的相似之处是：他们能笑。其他的悲剧作家则不能。不管我们怎样描述诗人们，我们总不会说他们笑；他们都是严肃的。只有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能证实苏格拉底的说法，他认为同一个戏剧作家既应该能够写悲剧，也应该能够写喜剧。一般的人会觉得在悲剧的气氛中插入一段喜剧会破坏整个戏剧优雅的品位，有些评论家对《麦克白》中的看门人颇有微辞便是一个例证。但使人们感到惊奇的是这两位伟大的剧作家不在乎品位的高低。他们高兴怎样写就怎样写。在所有悲剧中，最扣人心弦的一个情节是当阿伽门农的宫殿的大门关上，以防他儿子来杀他母亲的时候，他却装作报告自己的死讯的报信者赚开了宫门。他走进宫去，一心想的就是要成就这件可怕的事情，这时候有一个老妇人上场了，歌队唱道，她是奥瑞斯忒斯的

① 译文引自《阿伽门农》，罗念生译。

保姆。她哭诉道：

唉，我是个可怜的女人。我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可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麻烦。哎，奥瑞斯忒斯，小宝贝！哎，小冤家，他是我今生的克星。他的母亲把他交给我来照看，可他晚上的尖叫声时常把我从梦中惊醒，还有他平时没完没了的麻烦，我都得受着。一个人事不懂的孩子简直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小畜生。你得跟着他的屁股后面转。一个小孩子不会告诉你他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渴了，什么时候想撒尿了。他的小肚子一满，尿就出来了——有的时候我知道他要尿了，但大多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那就只好一块一块地洗尿布了。我不仅是个保姆，我还是个洗衣婆——

这位保姆真像是早生了两千年的朱莉叶的保姆，她就此下场了，然后就是弑母的那一幕。

也许可以说，莎士比亚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剧作家，而埃斯库罗斯，人们通常认为并不是。他是一个深思的诗人，他走上戏剧创作的道路完全是出于偶然。这种说法与事实颇为相左，因为他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天生的剧作家，他发现这个世界是如此具有戏剧性，为了表达自己，他必须要创造戏剧。戏剧确实是他的创造。在他之前，戏剧演出的时候只有一个歌队和歌队长。他加入了另一个演员，让剧中人物之间产生关系，这是戏剧最本质的东西。他至少是和莎士比亚同样杰出的剧作家，他不仅仅是戏剧的创始人，而且他还是一个演员和剧务负责人。他设计了所有希腊戏剧演员的服装；他还更新了舞台布景和舞台装置；他为

雅典的戏剧定下了规矩。

我们知道了他肩负着这么多的责任，就不会再奇怪他的作品中为什么会有很多错误。毋庸置疑，他写下了很多粗糙的句子，很多不好的章节；他工作起来不太细心，不注意细节。有时他会忽视必要的细节；有时又过于拖沓，比如说《奠酒人》厄勒克特拉认出奥瑞斯忒斯的那一节就写得过于平淡、简短，而描写发现坟墓上的一缕头发的那一节则用了一百五十多长行。但是他始终都很清楚他正在述说的故事中的真正富有戏剧性的部分，总是径入主题。在这种地方他是一点也不马虎的。他总是竭尽他所有的剧场技巧和戏剧力量来突出每一部戏剧的主题。继他之后的那两位剧作家的作品比他的作品要更富于戏剧性。他们的技艺更加高超，他们的技巧也更加成熟，但是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中的某些紧张的戏剧张力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所望尘莫及的。他不但开创了戏剧创作的先河，他还把戏剧创作推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后世只有莎士比亚一个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而从上面所提到的双重贡献而言，他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只能选出一段来证明这一点，因为我们选录的篇幅必须有相当的长度，才可以展现这种戏剧效果的特殊力量。在《奠酒人》一剧中，克吕泰涅斯特拉得知奥瑞斯忒斯还活着，并且杀死了她的情人。她就知道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于是她命令自己的家奴：

快！快去给我拿一把能杀人的斧头。我是赢，还是输，立刻就会见分晓。我站在苦难的巅峰。

（奥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一起上场。）

奥瑞斯忒斯：我找的正是你。另一个已经得到了他应得的报应。你爱他——你应该和他躺在同一个墓穴里。

克吕泰涅斯特拉：住手——啊，我的儿子。你看——我的胸膛，你沉重的脑袋曾经枕在上面睡觉，啊，多少次啊，你曾用你那无牙的小嘴，吸吮我的乳头，你就是这样长大的。

奥瑞斯忒斯：啊，皮拉得斯，我该怎么办？我的母亲——恐惧震慑了我。我可以放弃吗？

皮拉得斯：那么阿波罗的话又怎么办？还有你的誓言？宁可得罪所有的人，也不要得罪众神吧。

奥瑞斯忒斯：你说得对。我听你的。你——来跟着我。我带你到他死去的地方，也在那儿杀死你。

克吕泰涅斯特拉：我的儿子，你好像要杀死你的母亲？

奥瑞斯忒斯：不是我。是你杀死了你自己。

克吕泰涅斯特拉：我还活着——我站在自己的墓穴旁边，我听到了死亡的声音。[他们下场，歌队开始唱道，她的命运是公平的。]抬起你的头，啊，房子。光！我看到了光。

[宫殿的大门打开了，奥瑞斯忒斯站在两具尸体的旁边。]

奥瑞斯忒斯：对于这一个，我无可指责。通奸者就该这样死。但是她，她和丈夫生下了几个孩子，然而却设下了这可怕的计划来谋害他——你们认为他是什么？是蛇，还是毒蜂？哪个男人沾上她，就要倒楣。

歌队：可悲啊，可悲啊——这令人恐惧的行为。

奥瑞斯忒斯：她干了，还是没干？你们可以作证——她为非作歹，杀人害命。我是个胜利者，可又卑劣、肮脏。

歌队：这个麻烦还在这儿——新的又来了。

奥瑞斯忒斯：听我说，汲取教训，因为我不知道这将如何结束。我骑着一匹脱缰的马，我的思想超出了界限。恐惧正在我的心头升起。在我失去理智之前——啊，我的朋友们，我承认我杀死了我的母亲——可是并不是没有道理——她卑劣无比，杀死了我的父亲，神明厌弃她——看——看——女人——那里——那里——黑暗——如此黑暗，长长的头发如盘卷的毒蛇。啊，让我离开这里。

歌队：啊，忠干父亲的儿子，你看到了什么幻象？不要害怕。

奥瑞斯忒斯：不是幻象。我母亲派他们来的。他们向我蜂拥而来，他们的眼睛里滴着鲜血，仇恨的鲜血。你看到他们没有？我——我看到了。他们在驱赶我，我不能呆在这里了。

[他冲了出去。]

歌队：这种邪恶的仇恨什么时候结束？

该剧演到此处就落下了帷幕。还没有任何文学作品比这一幕更富有戏剧性。

埃斯库罗斯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他天生就是一个喜欢创新的人。他很高兴看到旧的东西衰落了，他也很高兴

帮助培植起了新的东西。当时在希腊出现了这个世界上此前从未有过的观念，埃斯库罗斯就是希腊思想的领导者，而不久之后，他就把他的追随者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他敏锐地观察到了那些令此后许多个世纪的人们沦为奴隶的错误的、愚昧的观念。他是最主要的理性主义者欧里庇得斯的先驱者。欧里庇得斯在他的《特洛亚妇女》对战争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但早在他之前，埃斯库罗斯就剥去了战争光荣的外衣，尽管他本人还是一位马拉松战役的勇士。他曾经行伍，因此才能像那些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一样清楚地知道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很奇怪，他竟然意识到金钱和战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
在每一个家里都可以看出
为那些一起从希腊动身的兵士
而感觉的难以忍受的悲哀，
是呀，多少事刺得人心痛啊。
送出去的人是亲爱的人，
回到每一个家里的是一罐骨灰，
不是活人。
战神的戈矛激战的地方提起一架天平，
用黄金来兑换尸首，
他从伊利翁把火化了的东西送给他们的亲人，
那是使人流泪的沉重的砂金，
代替人身的骨灰，

装在那轻便的瓦罐里的。^①

类似的段落《阿伽门农》之中还有很多。

希腊人有这样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繁荣会遭到上天的嫉妒，而且最终会以灾难告终，这可能也是希腊人最基本的信念，埃斯库罗斯用一句非常简短的话否定了这种信念：“我的看法与其他人不同，可我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将会带来灾难的是罪恶而不是繁荣。”

人们通常都认为激进和宗教是对立的，但是实际上伟大的宗教领袖都是激进的人。埃斯库罗斯是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但他不狂热，所以他能够抛弃宗教表层上的许多迷误，去探讨它的实质。诸神在他的戏剧里面来来去去，令人眼花缭乱，因为这些神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些影子，他对他们之间的矛盾不一和不相调和不感兴趣。他的眼光已经越过了他们而直接看到了那惟一的神：“父，在很久以前，他用他的双手创造了我们人类。”他相信，人类生活的苦难，尤其是无缘无故地遭受苦难这一神秘莫测之事在惟一的神明那里有一个终极的、完美的解释。无辜的人遭受苦难——如果上帝是公正的，那么怎么会如此？这不仅仅是悲剧的中心问题，而且只要人们开始思考，这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首要的问题，而且在不同的地方，只要人们处在同一个思想水平上，他们就会得出同样的解释，罪恶导致的惩罚会一直延续几代人，他们都会得到神给他们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不得安宁的家庭，遭天罚的同族，这样的主题在文学作品里比比皆是。“父致其

^① 译文引自《阿伽门农》，罗念生译。

罪，子获其罚。”俄狄浦斯和阿伽门农必须为祖先恶行承担罪责。偷窃来的黄金最终毁灭了沃儿森家族。但这只是一种折衷的说法而已，那些道德观念正在觉醒的人们会对这种说法感到满意。但这不能使埃斯库罗斯感到满意。

当他开始思考“那些穿越永恒的思想”的时候，他是孤独的。和他大约同时代的希伯来人以西结意识到靠这个办法来实现神的公正本身就是不公正的，他强烈反对子孙来承担父辈的罪恶造成的恶果这种决不可容忍的荒谬的做法，但他的办法是否认父辈的人有罪。犹太人总是满足于“神这样说”，这种态度根本就没有给悲剧留下立足之地。他们可以接受完全非理性的行为，而且他们也心安理得地承认这种行为；他们并不像希腊人那样认为他们所面对的现实是无可逃避的。

埃斯库罗斯的探索比常人所接受的那种解释深入了许多，这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他说：“只有我自己不相信事情本该如此。”他总是把这个问题推向极致，妻被迫去杀夫，子被迫去弑母，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是那世代代冤冤相报的信念。他不能满足于任何“轻微医治”这个世界的“重创”的解决办法。他看到一种无情的力量发出了诅咒；他知道父辈们犯下的罪恶的后果正由他们的子孙们来承担；他相信神是公正的。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人类的经验比其他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有更多的了解，而他在这些经验中发现了和这些事实相互调和的事实，那就是，痛苦和错误也有其自身的目的和用途：它们是知识的阶梯：

是宙斯引导凡人走上智慧的道路。因为他立下了这条有效的法则：智慧自苦难中得来。回想起从前的灾难，

痛苦会在梦寐中，一滴滴滴在心上，甚至一个顽固的人也会从此小心谨慎。这就是坐在那庄严的崩公凳上的神强行赠送的恩惠。^①

他是一个伟大而孤独的思想者。只有偶尔的情况下，才有一些非常伟大的人物能达到他的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而他对这个世界之谜的洞察至今也无人可以企及。

^① 译文引自《阿伽门农·进场歌》，罗念生译。

第十三章 索福克勒斯

典型的希腊人

叔本华说，分析到最后，悲剧的快感是一个接受的问题。这位悲观的大哲学家是在依一位悲剧家来给所有的悲剧下定义。他的定义只对索福克勒斯最合适，他用这个字完美地表达了索福克勒斯的戏剧精神。接受不是默认，不是屈从。因为没有其他路可走而被动接受和悲剧没有任何关系。“事情非如此不可，而悲剧就是对这种激情的接纳”，也就等于说“看，我现在来完成你的意愿”，接受是指人说这些话的时候的那种精神状态，它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但这种精神和斗士的精神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其实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接受生活，因为它清楚地看到生活必然如此，而不会是其他的样子。“我们必须像来到这里一样，忍受从这里开始的旅途。”努力去理解那些不可抗拒的事件的发展变化会令人感到迷惑；特别是当我们发现我们对事物的发展几乎不能产生多少影响，一如我们不能对在轨道上运行的星球产生多少影响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即便如此，我们却也不仅仅是旁观者。这个世界上有高贵、善良、温文尔雅的品质。面对命运，人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人们可以求善，可以高贵地忍受痛苦，接受死亡。“成熟就是一切。”

这就是索福克勒斯的精神，这种精神和埃斯库罗斯的精神不同，和一个人在一艘将要沉没的船上让妇女和孩子登上救生艇，而自己平静地接受死亡的精神不同，和伊丽莎白时代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战斗中指挥着那艘名为“复仇”的小船抗击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的那位绅士的精神也不同。这两位悲剧家之间前后相隔几乎还不到二十年，但是雅典的生活的洪流真可谓一泻千里，当索福克勒斯长大成人的时候，那种使雅典在马拉松、温泉关、萨拉米斯等战役中获得胜利的人生观早已经是往事了。这些名字甚至在今天还能使我们回想起那些往事，“那时候神就是人，他们一样地行走在这个世界上”。即使在今天，我们仍能想见人们看着那些英雄壮举的光辉逐渐暗淡下去、那些宏伟的理想最终走向失败究竟意味着什么。雅典人给这个世界带来了自由，然后却自己毁灭了自己光辉的前程。她变成了一个强大、霸道、暴虐的帝国。她将整个希腊都置于自己的桎梏之中，这使得整个希腊都起来反对她，在索福克勒斯去世之前，斯巴达人已经兵临雅典城下，雅典已经是日薄西山。作为一个垂垂老者，当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些著名的诗句：

……

等冥王注定的命运一露面，
那时候，再没有婚歌、弦乐和舞蹈，
死神终于来到了。
一个人最好是不要出生；
一旦出生了，求其次，
是从何处来，尽快回到何处去。

等他度过了荒唐的青年时期，
什么苦难他能避免？
嫉妒、决裂、争吵、战斗、残杀接踵而来。
最后，那可恨的老年时期到了，
衰老病弱，无亲无友。^①

这些话不是他的生活信念。他写这些诗句的时候已经颓然老矣，心中也正充满悲哀，这两者都是非常可悲的。这是他一生的写照：他年轻的时候正是希腊充满希望的时代；他成年的时候雅典城遭受了战争和党派之争的蹂躏；他老年的时候，美、宽容以及公平的生活，这些雅典赖以存在的东西，都已经岌岌可危了。这是一个老人在总结自己的一生，而这时人生的情感乃至人生的理性都已经流逝，但这些不是这位伟大的诗人对人生的最后论断。他曾对生活作出判断，字字铿锵，毫不含糊其辞。他生活的时代正是考验人们的性情的时代。对那些性情脆弱的人来说，所有的事情都陷入了绝望之中。似乎天空中闪烁的群星都暗淡下去了，真理和正义也云烟散尽。但对索福克勒斯这样的人来说，外界事物的变化并不能改变他们内心坚定的信念。伟大的心灵能区别对待转瞬即逝的东西和永恒不变的东西。索福克勒斯对他所热爱的这个城市绝望了；对他来说，恶，而不是善，已经来临；但是，按照他对生活的看法，外界环境在最终的意义上来说是没有力量；在他自己的内心中，他断言没有人是无助的。在我们的内心之中有一个堡垒，在这个堡垒之中我们可

① 译文引自《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罗念生译。

以控制我们自己的精神；活着做一个自由人；死则无背于人性。埃阿斯说：人总可以高贵地生，高贵地死。安提戈涅奏响死亡的钟声的时候是很坦然的：死是她自己的选择，当她死去的时候，歌队唱到，她是“她自己命运的主宰者”。索福克勒斯眼中的生活是严酷的，但是他能承受生活是严酷的这一现实。当有人告诉得阿涅拉，她的丈夫对她不忠的时候，那个知情人不愿吐露真情，说话的时候有些吞吞吐吐，她催促她说：“不要用假话欺骗我。不知道事实的真相——那才真正会使我受到伤害。”这可以称为第二个俄狄浦斯的女人最后的话敲响了他所有戏剧中的最强音：“停止悲伤，因为这些事情无可改变。”除了带着不可动摇的力量来忍受痛苦和平静地接受死亡之外，他没有提供任何逃避现实的方法。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外在世界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而大多数的东西都是可悲的。索福克勒斯是忧郁的，但不是黑色的、苦涩的忧郁；在米尔顿的“沉思的修女”、“友情是虚假的”、“信仰并不长久”、“生活只是幻影”，这样的词句在索福克勒斯那里比比皆是：

克罗诺斯的儿子从来不曾
把没有痛苦的日子交给凡人。
但是欢乐和悲伤
时间的车轮
滚向每一个人，
甚至像沿着轨道运行的星星。
光明灿烂的夜晚，
命运，死亡，

它们从来不会等待世人。

财富来了又去，

悲伤和快乐也是如此。

这种说教有些危险，其一是太简单，再者就是它和陈腐的套话之间只有毫厘之别，很容易滑落为后者。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经常有很多警句：“人皆有一死”；“一个人只要活着还没死，就不能断定他的命是好是坏”；“生命的荣誉在于行动而不是言语”。即使是像他这样才华出众的人也不能将这样的词句运用到诗歌之中，但在这种地方，就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显示出他作为一个典型的希腊人，对对话和警句的热爱。值得奇怪的不是索福克勒斯一定要说教一番，而是埃斯库罗斯从不如此。这一点正是他们两个人众多的不同之中最基本的不同。

索福克勒斯是保守的，他极力维护现有的秩序。在宗教领域中，保守者总是倾向于形式主义。索福克勒斯认为“行而不虑及正义”和“对神的形象没有畏惧”是一样的。他满意地接受了奥林匹斯山的正统的等级观念，但是有他那样的心智的人不可能满足于此。他的至福直观和孩子气的神话中宣传的幻想和寓言故事完全不是一回事。他挂在嘴边的字永远是法律，当他试图去理解天堂的时候，他发现的是“任何健忘的头脑也不会忘记的纯洁的、值得尊重的法律，神也因此成为伟大的、永生的神”。他用“法律”替代了埃斯库罗斯如此珍爱的“自由”这个让人感到自豪的词。雅典对他来说是一个“遵守正义的法律，对上天无比敬畏”的城市。他喜欢“秩序”、“完美的谐和”、“节制、谨严、冷静”。人们可能

会猜想，自由对他来说意味着嘈杂、无序、放纵、不自持于正。在《安提戈涅》中，歌队唱到：“只要这法律还有效，那么没有任何降临到世间的庞大的东西不带着诅咒。”这是希腊人才会说的话。希腊语中所有表达“无边”、“无限”、“无尽”的词都有贬义。索福克勒斯喜欢他能清清楚楚地看到的東西。无限的东西对他来说是令人不愉快的。

在任何意义上说，索福克勒斯都是我们心目中最典型的希腊人，甚至可以说，所有希腊精神和希腊艺术的定义首先都是他的精神和他的艺术的定义。对整个世界来说，他是最典型的希腊人，他具有的品质是所有希腊人都具有的品质，只是这些品质在他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直率、清晰、简单、理智。过度——这个词在他面前最后不要提起。有节制是他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更突出的特点。美在他看来不仅仅表现在色彩、光和影之中，更多的是表现在结构、线条和平衡之中，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美不是根源于神秘，而是根源于明确的真实。在我们的观念中这就是古典的精神，和索福克勒斯比较起来，埃斯库罗斯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甚至在绝望之中，索福克勒斯的话也是那么的严肃、冷静。他最绝望的话也有一种理智的色彩：

只有卑贱的人才会希望长寿，
永远走在这从不离开邪恶的生活之路。
一天又一天的日子有什么乐趣，
时而快，时而慢，死才是惟一的目的。
那些感觉到内心燃起虚幻的希望的人们
在我看来毫无价值。

埃斯库罗斯的绝望又是多么的浪漫：

在神明的云朵的旁侧，
我愿是一缕黑烟。
全身隐没，向高空翱翔。
如无翅的尘埃，我将灭亡。
啊，周围的云朵落而为白雪，
给我在这高空中找一把座椅，
一处悬崖绝壁，向四处远望，
独自在高处沉思。
我要纵身跃下，直落到底，
只有鹰才能看见。

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都曾经描写过安提戈涅这个人物，他们笔下的安提戈涅最后的话语凸显出他们彼此不同的性格。索福克勒斯作品中的安提戈涅哀叹道：

没有人为我哭泣，没有朋友为我送葬，
没有音乐送行，我走上最后的旅程。
请看我遭受的苦难，又是谁对我不公，
只因我不曾放弃那崇高的情操。

埃斯库罗斯的女主人公却不是这样的：

没人可以这样命令我。
我虽是个女人，但我要为他
掘好坟墓，亲手埋葬他！
勇气！我将找到行动的力量。
谁也不能阻止我。

阿里斯托芬在《蛙》中也描绘了索福克勒斯的形象，但

他对索福克勒斯的描述和对所有其他人的揶揄都迥然不同。在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中，其他人像泼妇一样互相谩骂，像坏孩子一样互相打斗，其中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最是如此。索福克勒斯则显得与众不同，他温文尔雅、雍容大度，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生前既无可指责，死后亦无可非议”。即使是阿里斯托芬也不能在雅典的观众面前嘲讽索福克勒斯^①。索福克勒斯是最受大众喜爱的剧作家，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一点更能说明一般雅典人的智力水平和理解能力了。但是不管当时的观众和现在的观众在欣赏品味上存在多么大的不同，也不管这种不同是多么的令人嗟叹，他们这一点上是共通的：受到大众欢迎总是意味着人们的同情的温暖。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使他受到希腊人钟爱的那种温和雅致的精神，只有那些心胸非常博大的人才会有这种温和雅致的精神。双目已瞽的俄狄浦斯为他的孩子哀求道：

让我来摸一摸他们——啊，我只是想亲手摸一摸他们，我会觉得他们正在我的身边，就像从前我能够看到的时候那样。我听到的是哭声吗？我亲爱的人们就在我身边？快过来，我的孩子们。让我的手能抚摸到你们。这是一个崭新的乐音。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从来没有与此相类似的东西。

有慈爱的天性的人并不一定是激情澎湃的人。索福克勒斯是慈爱的，但在心灵最深处他却没有激情。他是一位伟大的悲剧家、一个无比伟大的诗人，但他抱着超然的态度观察

^① 诚然，阿里斯托芬也曾把索福克勒斯比喻为天堂里的西摩尼得斯，不过那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原注

生活。对于另外一个伟人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你的灵魂像是一颗星星，只身独居，”喜欢米尔顿的人总是能更好地理解索福克勒斯。他们两个人生活的时代也很相似，就像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很相似一样。当克伦威尔将英格兰置于欧洲的版图之上的时候，米尔顿也经历过一段充满希望的时代，但他也一样地看到他所热心的一切都流于失败，最后消失殆尽，他看到他的国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蒙受了耻辱，遭到了玷污”。他也一样学会了用“冷静的头脑和激情散尽”的态度来接受生活，并把它看成是和自己相疏离的东西。他崇高、庄严的诗歌中的世界就是《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的世界。

他们两个人一样的出类拔萃。可对我们来说非常遗憾的是，古希腊语已经不再是一门活的语言，索福克勒斯的完美之处也因此完全无法被人们体会到了。伟大的思想可以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而永生不灭，但伟大的风格只存在于一种语言之中。在所有的英语诗人中，米尔顿的非英语民族的读者最少。莎士比亚是英语风格的，可人们也一样可以称他为德语风格的，但是米尔顿只能是英语风格的。索福克勒斯和米尔顿是两位罕有其匹的风格作家。他们的作品总是有鲜明的艺术风格。他们总是表现出一种词、语句、音乐的抑扬顿挫的美感。和他们比起来，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都是舛讹多出的艺匠，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极为精妙的语言，也有许多拙劣的词句。米尔顿的诗歌在语言特征是典型的英语风格的；他的诗歌辉煌绮丽、词工句整、语出惊人，但他有的时候却变得平静、简单、明晰、直率，完全像是一位

古典作家，如果一个不能流畅地阅读古希腊文的人想要了解索福克勒斯的那种毫无瑕疵的语言风格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读米尔顿：

美丽的萨勃列娜，
请在你坐着的地方静静地聆听，
在那波光如镜、清凉明澈的水面下……
灰蒙蒙的檀香树迎来宁静的早晨……

这就是索福克勒斯的写作风格。

下面这首诗在实质和风格上都完全是索福克勒斯的风格的：

好了，好了；不要再哀悼哭泣，
也不要再说什么道理。参孙已经死去，
他无愧于自己的名字，
一个英雄就这样悲壮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必流泪，不必哭泣，
也不必捶胸顿足，不要脆弱，
不要轻视，不要看不起，
不要非难、责怪；只有公平、合理，
还有高贵的死带给我们平静的东西。

这完全可以说是索福克勒斯的文笔。

米尔顿不是戏剧家。他最大的兴趣是思想，不是故事情节。索福克勒斯很自然地转向了戏剧。他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当时戏剧是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但是值得怀疑的是他走上这条道路是否正是出于他自己的性格。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无疑比他在戏剧方面的成就要大。在戏剧的能力上他

比不上埃斯库罗斯。但是另一方面，单从和剧本创作很不同的戏剧演出效果上来说，他却更要出色一些，也就是说，他具有更高超的希腊式的技巧与才能：在他所涉猎的任何范围内，他都表现出了精湛的技艺。如果他写一部戏的话，那么无论从任何戏剧技术要求的角度来看，他都会做得非常好。我们可以想像这个年轻人观看埃斯库罗斯的《奠酒人》的时候，他会注意到每一个粗糙的细节和许多被忽视的高潮：他们不应该去谈论奥瑞斯忒斯的那缕头发；厄勒克特拉推测她哥哥来了，只是因为她看到那些脚印像她自己的，这实在是太傻了；她认出他的那一幕不应该那么简简单单地就放过去了，因为这一幕有可能写出非常有戏剧效果的东西来。于是他自己就开始来写非常细致的戏剧。这就是《厄勒克特拉》。这个剧很短，但没有浪费一个字；厄勒克特拉的性格在和她妹妹的对比之中清晰地表现出来了；那些精炼、有力的对话中的每一个字对说话者和观众来说都语带双关，都有非常震撼的效果；那缕头发被远远地放到了背景之中。相认那一场戏产生了它能产生的所有效果；最后结局一段也非常震撼人心。儿子前来替父报仇，他杀死了谋杀他父亲的母亲和她的情人。他谎称他是前来报告他自己的死讯的使者，并借此机会接近并杀死了他的母亲，他的妹妹坐在宫殿的门口。这时她母亲的情人向她走了过来，兴冲冲地告诉她说他们害怕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埃癸斯托斯：报告奥瑞斯忒斯的死讯的那些陌生人
现在在哪儿？

厄勒克特拉：在里面。他们找了直接通到女主人心的

脏的路。

埃癸斯托斯：我可否亲眼看看死尸？

厄勒克特拉：完全可以。

（宫殿的门打开了。里面放着用尸布裹起来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尸体。奥瑞斯忒斯站在尸体的旁边。）

埃癸斯托斯：我是他的的亲属，请揭开盖在她脸上的布，好让我祭奠她一下。

奥瑞斯忒斯：你自己去揭开吧。

埃癸斯托斯：好吧——但是你，厄勒克特拉，如果克吕泰涅斯特拉就在附近，你去叫她到这儿来。

奥瑞斯忒斯：她就在这儿。不用往远处找。

（埃癸斯托斯揭开了盖在尸体脸上的布。）

埃癸斯托斯：我看到了什么——

奥瑞斯忒斯：为什么这么害怕？这张脸你难道不熟悉吗？

揭开盖在尸体脸上的那块布的那一幕有非常强烈的戏剧效果。这是该剧中的高潮时刻。但是索福克勒斯这部戏围绕的是弑母这一情境，这是任何戏剧效果都不能超越的。该剧没有在这一行动上多费笔墨。当儿子杀死母亲之后走出来，他自己和她的妹妹都认为他干得很利落，然后戏剧马上就转到了真正的高潮，也就是杀死埃癸斯托斯的那一场戏。索福克勒斯故意避免表现弑母的那场戏的恐惧场面。他代之以对谋杀者的正义的惩罚，埃癸斯托斯的死不会引起观众的怜悯和恐惧。他曾经说过“对人来说过于伟大的思想”不是人应该说出来的。他有完美的艺术家的那种坚定的直觉：他从来

没有尝试去做那种过于艰巨的工作来展现尽善尽美。他没有创作真正完美的戏剧所需的那种激昂的情绪。他在诗歌表现方面有极高的天赋，极高的智力水平，以及无出其右的完美技艺，但是他没有达到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达到的那种高度。

第十四章 欧里庇得斯

现代的思想者

伟大的评论家亚里士多德说过，欧里庇得斯“尽管有很多缺点，但他仍旧是所有的诗人中最具有悲剧性的”。他对欧里庇得斯的这个盖棺之论直到最近才有人提出异议。他的这个论断使后世的人对他形成了这样的态度：这个伟大的批评家错了；他错将悲伤和悲剧混为一谈了。欧里庇得斯是所有诗人中最悲伤的，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不是最具有悲剧性的。但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伟大的悲剧家，是世界上四位最伟大的悲剧家之一，他具有那种神奇的力量，通过向我们展现痛苦而把我们提升到真正悲剧的高度。

欧里庇得斯当然能够达到“激昂的高度”，但他最了解的还是黑暗深重的痛苦。他是“世间的悲苦诗人”，他比任何作家都深切地感觉到人类生活的可悲，就像孩子们无助地忍受他们不了解、也永远无法了解的苦难。没有任何一个诗人的耳朵像他那样敏锐地聆听到人性宁静而哀伤的乐章，一种在他之前很长时间人们从未注意过的旋律。此外，他还注意到人们甚至更少注意到的个人的价值。他是古典世界中惟一有这样的感觉的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写下的作品中的两个主题，也就是对苦难的同情和个人

价值的信念，竟然让人觉得是我们当今这个世界中的两个主旋律。一个古代世界的诗人说的竟然是我们要说的话。

这种思想永远都是现代的思想。不管相隔的时间多么漫长，有这种思想的人都承此一脉。在本世纪之初，当墨雷教授翻译的欧里庇得斯开始广为流传之后，欧里庇得斯最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他的现代特征：他说的正是人们1900年的时候说的话。现在，新的一代人对20世纪的文坛新星，如乔治·梅瑞狄斯、亨利·詹姆斯，或维多利亚时期以后的其他人都不太在意，但他们读到欧里庇得斯的时候，都感到他们之间是相通的。公元前四百年时的年轻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在未来的许多个世纪里人们也仍旧会有这样的感觉。所有走在时代的前列的人总是会发现欧里庇得斯表达了他们自己的精神。他是一代又一代的现代思想者的代言人。

这种精神体系从来都存在，并且永远也不会改变，它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毁灭的精神，它是批判性的而不是创造性的。柏拉图说：“如果生活中没有批判，那么这种生活就是毫无价值的。”每一代人中的现代思想者都是那些使我们避免陷入一个僵化的世界，使我们不能沿着我们的祖先的路一成不变地走下去的批评家们。所有的成规旧例对他们来说永远是错误的。他们要批判、批判、再批判。犬儒式的批评和现代思想者的精神是大相径庭的。那智慧之王看着他亲手创造的一切和他苦心经营的一切，看到这些不过是空幻虚无、徒耗精力的东西，他也不是现代的思想者。读《圣经·传道书》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人们向来就做如此想，并将永世作如此想”；但它从来没有让人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是现代的。

它是这个时代的新的声音。”伟大的智者、批评家伏尔泰也是如此，他挥动他的如椽巨笔扫荡了他那个时代的所有令人不快的事情，直到这些东西的根基被扫荡净尽。他也不是一个现代的思想者。“我不知道什么是不朽，但不朽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东西。”他这句话最恰当地说明了他的思想态度，但他这种态度属于另外一个思想体系。他的态度是批判的态度，他的矛头指向人间的事物，但是却不包括“人类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人的心灵”，而这种人间事物与不朽事物之间的分别与现代的思想者无缘。

无论如何，他们关心人类生活和人类的事情，而且从来也不曾对此弃而不顾。他们为人类忍受痛苦，他们一门心思在思考的也是关于痛苦的问题。他们最为敏感的话题是“这个世界上巨大的痛苦”。他们看到的完全可以避免的苦难，和他们设想的完全可以避免的苦难对他们来说是绝对不可忍受的。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无穷的忍受痛苦的能力，面对如此深重的痛苦，他们心中的强烈的怜悯之情使他们不能相信任何哲学，不能无动于衷。他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最可悲的事情，那就是不公正，他们的心中由此激发起了强烈的反抗情绪。他们不会接受常规旧例，因为那经常是非正义的幌子；他们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不惜一切地撕下所有可憎恨的事物的面纱：他们对一切冠冕堂皇和让人心安理得的事情都提出疑问。他们不是那些“关心生活中所有的方方面面”的人；他们不去考虑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的美好的事物；他们的眼睛只盯着那些丑恶的事物。但是他们却从来不会感到绝望。他

他们是反抗者、是斗士。他们从来不接受失败。他们能够深刻地洞察所有的丑恶和苦难，而且觉得它们是绝对无法忍受的，但他们从来不认为人类的思想遭到了失败，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种批判的、颠覆的、破坏的精神很少会在诗人的身上表现出来。世俗的文学作品中，现代思想者大体上可以忽略不计。事物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如此。天才们要去创造，而不是去毁灭。只有很少的人能以一身兼此两任。欧里庇得斯出生前三百年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天才人物，他完全是一个现代的思想者，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深切地感到人类生活的可悲，人类的不公正是多么罪恶，他明亮的眼睛也能够穿过美丽的外表看到事物的本质——他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知以赛亚。他的嘴上被人放上烧红的火炭，而他用超过了所有人的优美典雅的话语，为那些遭受痛苦的人对那些为非作歹的人提出了最有力的控诉。

以赛亚和欧里庇得斯是文学领域中的现代思想者的杰出代表。他的字字句句都对人类的罪恶行为提出了控诉：“我们寻求公正，却到处都无法寻见；我们寻求拯救，但它却离我们如此遥远。……正义在遥远的地方：因为真理跌落在街上，正义也无法进来。是的，真理跌落了。……每个人都在寻求报偿；他们都不去管那些失去父亲的孩子，也不去管那些寡妇，他们收取报偿，为邪恶的人开脱罪责，却使穷人受尽了煎熬，……他们把恶称为善，把善称为恶。……如果人们走进旷野，他们会看见天上的光暗淡了，他们看到的是痛苦、黑暗、昏暗和苦闷。”

他的愤怒的火焰伴随着深深的怜悯：“上帝使我来安抚心碎的人……如同母亲抚慰自己的子女，我也要抚慰你们……一个妇人能否忘掉自己哺育大的孩子，对从己而出的子女没有怜爱之心？她们也许会忘记自己的儿女，但我不会忘记你们……我就是上帝，抚慰你们的神，我要使盲人重见光明，使监中的囚犯得以出狱，把坐在黑暗之中的人放出牢房……啊，你们受煎熬的人，被暴风雨袭击的人……我因为一点恼怒，藏起身形，但以我永远仁慈，我将怜悯你们。”

我们不可能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去寻找这样的段落，甚至也不可能去寻找与此类似的段落；他写作的方法与以赛亚截然不同。欧里庇得斯对罪恶的控诉不是通过某些段落，而是通过他的戏剧整体表现出来的。他的青壮年时期正值雅典和斯巴达之间连年的战争。他自己的城邦在战争初期获得了胜利，但是雅典迅速扩张的力量没有迷惑他的眼睛。他注视着战争的发展，而他能从光荣的假象看到它背后隐藏着的罪恶，他写下了《特洛伊妇女》——那是一群被俘的特洛伊（伊）妇女在等待着胜利者们将他们送入奴隶生活的深渊，《特洛伊妇女》是他眼中的战争。特洛伊城的陷落在历史上是关于战争的诗歌的最辉煌的主题，在他的剧中却是这样的结尾：一个肝肠寸断的老妇人坐在地上，怀里抱着一个死去的孩子。

我们同样也不能通过摘引他戏剧中的段落，来说明他对那些遭受不幸的人们的温柔情感和他对人生价值的重视。他把一个无知的农夫和一位公主放在一起，并向人们展示了他至少和她一样高贵。即使理想主义者柏拉图也不会这样做。

甚至那些奴隶们，他们在古代的人类价值观念中根本就不是人，而只是一些有生命的动产，但他们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中也获得了正义，他们也是一个一个的人。欧里庇得斯有另一套标准：“无所畏惧的人不可能是奴隶。”耆叟、老妪甚至是老奴隶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是完全不被人重视的，而他对他们也有着切切的同情和深深的理解。赫卡柏和李尔王仍旧是所有描写孤苦的老年人的文学作品中最动人的形象。

这种同情之爱的精神使他深深地了解到人类心灵的深处，比他的两位先行者要深得多。除了他自己，无论是埃斯库罗斯还是索福克勒斯，都不能描绘出像《特洛伊妇女》结尾表现出来的那种无比痛苦、却又富有人性的场景。大获全胜的希腊人派传令官来告诉安德洛玛刻，她的儿子将要被人从特洛伊的城墙上扔下去。她对她的孩子说：

我最心疼的乖乖，最宝贵的孩儿，你得离开这可怜的母亲；死在敌人手里。……儿啊，你在哭吗？赫克托尔再也不会从地下起来，举着闻名的戈矛保护你。

啊，你曾经是我怀中的小宝贝，母亲最疼爱的婴儿，你的肌肤曾放出一阵阵的乳香，只可惜我白白地包裹你，白白地哺养你，白受苦，白费力。这时期，快拥抱我，拥抱你的母亲，用你的手搂住我的脖子，同我亲吻，这是最后一次了。

快把他领去，把他带走，你们想摔就摔死他！还可以把他的肉弄来吃了！神明这样害了我，我没有力量使

这孩子免于死亡。^①

当那个小男孩被摔死之后，她的母亲被送上了一条开往希腊的船，孩子的尸体被人送到了她祖母那里，这位老妇人抱着孩子，对他说：

可怜的孩子，你先人的城墙，阿波罗建筑的城墙，竟自就这样凄惨地磨去了你的头发，这美丽的鬃发，你母亲时常摸它，时常吻它！鲜红的血从这破骨间射了出来；这惨相我真不该形容。

这双小手……这可爱的嘴唇呀，你先前说过多少夸口的话，如今却只是紧闭着；你曾跳到我床前这样哄过我：“啊，祖母，我要为你割一大把头发，引一大群朋友到你的坟前，告一声亲热的永别！”但如今不是你为我送终，而是我这没有了城邦，没有了儿女的老年人来埋葬你这小孩，你这可怜的尸首。^②

这里没有任何一个被作者提升到常人无法接近的高度的那种神情冷峻、态度严肃的人物形象。欧里庇得斯关心的是人类的心灵，传说中神秘的特洛伊公主和王后在他的笔下变成了饱受苦难的女人，她们的感受是其他任何地方的女人都会感受到的，她们惟一超出众人的就是她们忍受着最深重的苦难。他对人类的本性有着深的了解，他这些生动的笔触把他剧中的人物紧紧地拉到了我们面前：母亲最后一次把她的脸埋进孩子散发着乳香的颈项之间；那个老妇人想起一天早晨，那个小男孩爬上她的床，告诉她当她死去的时候，他

① 译文引自《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罗念生译。

② 译文引自《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罗念生译。

会带着他的朋友庄重地为她送葬。这里没有悲剧高潮，可这是有史以来人们描绘出的最令人悲伤的场景。没有任何其他描写痛苦的文学作品能够望其项背。

现代的思想者的思想性的另一面，那种永远在审视、永远在质疑的精神，也同样难以援引例证。在《以赛亚书》中这种精神在每一声控诉中都表现出来，即使最浮皮潦草地读一下也会发现这一点。这种精神还时而在他尖锐的判断中表现出来。他敏锐、怀疑的目光看到的罪恶即使在两千六百年后的今天还仍旧不是非常容易能看清楚：“诅咒那些贪婪的人，一片一片掠夺土地，要把整个大地占有。”他简洁地道出了富人广霸土地的罪恶，这也是英国现在的土地问题的症结所在。欧里庇得斯在《美狄亚》一剧中关于妇女的段落不久以前还多为支持妇女享有选举权的人士所援引，那同样也是一篇颇具远见卓识的评论：

他们男人反说我们安处在家中，
全然没有生命危险；他们却要擎着长矛上阵。
这说法真是荒谬。我宁可提着盾牌打三次仗，
也不愿生一次孩子。^①

实际上欧里庇得斯的批判精神比其他任何诗人都要鲜明。在他生活的时代，批判精神在雅典的思想领域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在这座辉煌的城市中，人们有着很快的生活节奏，欧里庇得斯和埃斯库罗斯之间相隔还不到半个世纪，但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变化却着实令人震惊。在索福克勒斯的身上

① 译文引自《美狄亚》，罗念生译。

却找不到这种巨大的变化的影子。虽然他比欧里庇得斯还要晚一两年去世，他却属于较早的那个时代。也许索福克勒斯游离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精神之外，即使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也照样如此。索福克勒斯是个彻头彻尾的艺术家，别人与他自己无关，只是他的艺术主题，并且他如生活所是的那般接受生活。面对生活的现实而慷慨激昂地大发议论，这在他看来是孩子气的举动。“把怒气降到我们老年人头上，这是神明的乐趣”，这是无辜却瞽目蒙羞的俄狄浦斯在走向死亡时最后说的话。没有人能够回答的问题，索福克勒斯不去问它。

索福克勒斯的对面站立着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他们两个人有很大的不同，但却有着紧密的联系。埃斯库罗斯的时代萌发的怀疑精神使埃斯库罗斯也产生疑问和惊奇。他从来不会因为他发现某件事情原本就如此就对它不再多加考虑。他同样也用他明察秋毫的眼睛来观察战争，索福克勒斯平静地接受的“奥林匹斯山上暗淡下去的神明体系”是他完全无法接受的。他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的思想者。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时代中，他也不会认为人类在总体上是可悲的。实际上，他最主要的情感不是怜悯。他有那种斗士的性格，他总是面向未来，从不眷恋过去。但比这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出，他坚信人类能够创造辉煌，而勇敢地面对灾难是正当的。同索福克勒斯一样，在他的作品中也找不到那种面对生活的现实而慷慨激昂的抗议，但却完全出于不同的原因：英雄的死唤起的不是怜悯和愤怒。

虽然欧里庇得斯在这一点和埃斯库罗斯截然不同，但他却是埃斯库罗斯精神的继承者；他直接继承了埃斯库罗斯，

他越过了索福克勒斯，好像他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埃斯库罗斯对当时的宗教不屑一顾，欧里庇得斯则对宗教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一次又一次展示了通常人们心目中的神都是诲淫的、妒忌的，都有着邪恶的动机，他们比受他们降下的苦难折磨的人类还要卑下，而且他对这些神都毫无敬意：

不要说天上没有通奸的男女，
我在很久以前就知道并非如此。
神如果是神的话就什么也不会缺少。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可恶的鬼话。

他最后说：“如果神明作恶，那么他们就不是神明，”他以此摒弃了神，也摒弃了后世人所说的人按自身的形象创造了神的说法，这种说法在这个世界上流行很多个世纪，直到今天还仍然很有市场。伟大的思想家竟然能够如此地超越他的时代。在他看来，世上没有任何确定无疑的东西：

因为谁知道我们称为死的不是生，
我们说的生不是死——谁能知道？
除了我们生活在太阳底下的人
都有病痛，都有苦难，
还有所有那些前人
既无病痛，也没有邪恶缠身。

阿里斯托芬在《蛙》中对他的评价归纳起来是：他教给雅典人“去思考、观察、理解、怀疑、质问每一件事物。”

相传欧里庇得斯是个郁郁寡欢的人。他离开了这个喧嚣的世界，在他的书斋里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古书上有人描述他“阴郁、面无表情、不喜与人为伍”。他们说他是那个厌恶

与别人交往的人，与人比起来，他更喜欢与书打交道。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不真实的了。他之所以离群索居，是因为他太关心人类了。他不能忍受他心中那种强烈的悲天悯人的感情带来的压力。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令人悲哀的时代。雅典最后的失败已不可避免，雅典人开始变得恐惧、凶狠、残忍。而欧里庇得斯必须要肩负两副重担，一是一个伟大的诗人的那种敏感，还有就是现代的思想者所有的那种揪心的怜悯之情。一个这样的人怎么会允许自己和他的城邦逐渐容忍和赞美的那些丑恶的东西发生关系？为了帮助他的城邦，他只有两件事情可做：他只能靠他这种写作方式来向人们昭示他们的凶狠和残忍的罪恶，以及柔弱、邪恶的人们忍受苦难的可怜之处，以此唤醒人们记起他们现在正努力去忘记的那种恻隐之心。

欧里庇得斯在他的有生之年不很受人欢迎，可在他死后不久，他却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赏识，乍看上去，这颇为费解，可等我们了解了这两点，这个问题就不难解释了。他只有五部戏剧获得了最高奖，而索福克勒斯则足足有二十部。阿里斯托芬对埃斯库罗斯称赞有加，对索福克勒斯则给予了最高的赞誉，但他对欧里庇得斯却极尽褒贬。现代的思想者从来不会受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广泛赞赏。人们不喜欢被人逼着去思考，至少不喜欢被人逼着去思考那些最基本的问题。索福克勒斯用诗歌的笔触描写了古代诸神的辉煌的形象，观众们在看完了他的戏之后回到家里，心里会坚信过去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但是欧里庇得斯却是一个异教徒，他会严重地搅乱人的内心，他从不愿意让人轻松地满足于他们自己最喜

欢的信念和偏见。奖赏不是为他这样的人准备的。虽然如此，在他死后不久，人们对他的评论转向了另一边，那些关于他如何受人喜爱的引人入胜的故事也得以流传了下来。

每一个时代的教条性的信念都会被时间的洪流涤荡干净。绝对真理的陈述会变得越来越单薄、陈旧，最终被人们抛弃。一个时代的异端邪说会成为另一个时代的正统信念。纯粹理性的批评者所得出的结论不会长久不变。欧里庇得斯对宗教的上层结构的批判很快就为人们所忘记了。人们还记得他，还去读他的原因，是他对那些在一个充满痛苦的世界中忍受苦难的人们的深刻理解，他勇于毁灭旧的谬误的那种无畏的精神，还有他追求可能是善的新生事物的那种执著的精神。而后世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都把他和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们相提并论，他们同样都：

感到世上的深重的痛苦，
尤其是他们如同可怜的入类的奴仆，
一心一意为人类造福。